

贛政十年——熊式輝在江西的權力建構 與核心幹部探析

余以澄

摘要

熊式輝善於審時度勢，在政治上具有獨到眼光，自北伐起便逐步建立自身在蔣介石心中的位置，並透過人脈的累積，為往後仕途鋪路。主政江西的十年間（1932-1942），熊式輝在政治派系及黨務群體間捭闔縱橫，一面利用剿共形勢擺動權力的天秤，一面培養核心幹部，最終建立其在省內穩固的黨政軍權威。在一系列的政治競合中，江西黨政關係運作的細節，以及剿共體制下軍事機構權力擴充的實像，皆嶄露無遺。

作為蔣介石重要的謀士，熊式輝在中央與地方廣結人脈，身旁亦圍繞一群得力幹部，但他並未利用這些資源打造政治小組織，僅願以個人之姿追隨領袖，這樣的選擇來自其政治性格與見識。熊式輝與幹部群體的關係，亦猶如他自身政治實踐的延伸。

關鍵詞：熊式輝、江西、黨政關係、政學系、政治人脈

The Road to Authority: Hsiung Shih-hui and His Cadre Group in Kiangsi Province, 1932-1942

I-cheng Yu*

Abstract

Using his political skills and keen insight, Hsiung Shih-hui successfully build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took the position as Chiang Kai-Shek's staff officer during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He gradually gained trust from Chiang and became a rising star in Kuomintang politics. During his long tenure as the Chairman of Kiangsi Province (1932-1942), Hsiung was faced with a complicated political-military environment. He managed the campaign against the Communists, adjus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the KMT party branch, nurtured his own cadre group, and ultimately consolidated his authority in the province. In these delicate political maneuverings, Hsiung's ascendance allows us to examine the unusual functioning of local power and command systems that was key to an understanding of Kuomintang China.

Although political connections were critical in one's career in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and Hsiung himself was benefited from such connections in obtaining key offices, he never organized his cadre group in Jiangxi into a personal following. He served Chiang Kai-shek as an individual rather than the leader of a faction. His political character and loyalty to Chiang determined this choice, which gave him a special place in Kuomintang history.

Keywords : Hsiung Shih-hui, Kiangsi Province, party-government relations, Political Study Clique, political connections

*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贛政十年——熊式輝在江西的權力建構 與核心幹部探析*

余以澄**

壹、前言

熊式輝（1893-1974），字天翼，江西安義人。早年投身革命，青年時期先後就讀清河陸軍軍官預備學校及保定軍校，並於1920年代赴日本陸軍大學深造，歸國後亦擔任軍職。國民革命軍北伐期間，熊氏透過機運與個人膽識，逐漸獲得蔣介石的青睞，最終於1931年12月起擔任江西省政府主席長達10年。¹ 熊式輝治贛期間，在剿共的背景下推行保甲、行政督察專員制、省政府合署辦公等重要的制度改良，並協助蔣介石發起新生活運動，將江西作為政治現代化的實驗場。² 作為蔣介石重要的謀士，熊式輝在黨政高層人脈眾多，尤其在抗戰期間赴重慶擔

*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惠賜寶貴意見，在此申謝。本文之寫作，承蒙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熊式輝日記解讀班」諸同仁之鼓勵，謹致謝忱。初稿曾於2022年11月發表在「形塑傳記：歷史性與日常性學術研討會」，感謝蘇聖雄教授評論。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收稿日期：2023年8月17日；通過刊登日期：2023年9月26日。

¹ 熊式輝的傳記資料，可參見〈天翼年表〉、〈自傳底稿〉、〈熊式輝傳略〉，收入熊式輝著，林美莉校註，《熊式輝日記1930-1939》（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22年）；吳相湘，〈熊式輝治軍行政外交〉，《民國百人傳》，第四冊（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1年），頁153-162。

² 張智瑋，〈蔣中正國家建構的型範：戰前江西之經驗（1930-37）〉（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14年）。

任中央設計局秘書長後，為中樞研究各項政策，聲望更是水漲船高。

以往學界對於熊式輝主政江西的研究，普遍聚焦在施政成效上。³ 而尚未被關注的，是權力背後錯綜複雜的脈絡。熊式輝從一位軍人到省政府主席，乃至主政江西10年的歷程中，面對政治軍事環境所展現出的才能、手腕與人脈積累，逐步建構自身權力，其細節值得探討。江西地方政治素為複雜，又經歷剿共與抗戰的歷練，探索熊氏如何從中站穩腳跟，開創10年穩固統治，有助於吾人加深對現代史上地方政治權力運作的瞭解。而熊身邊的核心幹部亦不可忽視，正是這群人為其打造出統治江西的獨特規模。透過上述視角，能夠填補以往學界對省級政治人物研究的稀疏之處。

本文利用熊式輝日記、國史館典藏檔案、中國國民黨黨務史料及各類回憶文獻，考察熊式輝主政江西時期的權力發展及核心幹部，從中分析其政治性格與用人方針，綜論這位「政學系」官僚具有的見識與實踐。

貳、從軍人到省政府主席

一、北伐前後的江西政壇

探討熊式輝的江西10年，有必要認識該省既有的政治環境，才能較為深入的分析往後一系列的政治發展。尤其是1924年國民黨改組及北伐前後的政治變遷，對於江西政壇的影響極大。這段時間的國共關係、黨政紛爭乃至派系互動，其遺緒在後續20年的江西不斷發酵。

江西省自辛亥革命後，最初的3任都督皆不久任，直到1912年3月由李烈鈞接任都督，政局才逐漸穩定。然而，李氏在省政權力的問題上與袁世凱發生衝突，

³ 李政儒，〈熊式輝與江西省政（1931-1941）〉（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16年）；笹川裕史，〈1930年代国民政府の江西省統治と土地税制改革〉，《歴史学研究》，第631號（1992年4月），頁16-32；董千萍，〈熊式輝督贛時期的江西經濟建設（1931-1941）〉（上海：東華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

間接促成二次革命爆發。隨後，國民黨在江西的勢力遭到破壞，由北京政府掌控省政，先後有李純、陳光遠、蔡成勳、方本仁、鄧如琢的軍政統治。⁴ 江西的國民黨人則轉向地下，建立中華革命黨江西支部，等待政治形勢的變化。

1924年國民黨改組，實施聯俄容共，各省陸續成立省黨部。江西省省黨部亦於隔年7月在南昌秘密成立，積極策劃民眾運動，響應北伐。1926年11月，北伐軍克復南昌，國民黨在江西的黨務得以公開進行。然而，當時省黨部內的主要領導幹部皆為跨黨人士（即在聯俄容共政策下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的中國共產黨黨員），黨務活動左傾，使部分國民黨人士感到不滿，省內的國共關係漸趨緊張。⁵

1927年初，江西的國民黨人決定團結抵抗共產黨勢力，隨後在中央黨務領導層的授意下成立了「AB團」，由程天放、段錫朋等人指揮，並在與跨黨人士的周旋中成功取回黨政權力。⁶ 同年4月，共產黨人展開反撲，策動流氓暴徒搗毀省黨部，拘禁程天放等黨務領導人，AB團隨即解散。事件過後，江西省的權力核心重新被跨黨人士及國民黨左派所控制。⁷ 然而，左傾勢力同樣維持不久，隨著中央清黨與武漢分共的接連發生，中共勢力大受打擊。8月，中共發起南昌暴動，失敗後便退出江西政壇。而部分國民黨左派仍留在江西省黨部與省政府任職，他們因為傾向武漢國民政府及汪精衛，故在日後被視為改組派，並在省主席朱培德的庇護下活動。

儘管AB團的組織已經消散，但其中個別人物仍持續在江西政壇發揮影響，形成以人脈關係為主的地方政治派系，主要人物為段錫朋、周利生等。他們雖然

⁴ 何友良編，《江西通史》，第一冊（臺北：昌明文化有限公司，2018年），頁61-103。

⁵ 程天放，《程天放早年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8年），頁70-78。

⁶ 程天放（1899-1967），江西新建人，五四運動時任上海學生聯合會會長，1920年起赴美、加留學，並在美國加入國民黨。1927年任國民黨江西省黨部執行委員兼宣傳部長、江西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廳長。〈程天放先生事略〉，收入國史館編，《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一輯（臺北縣：國史館，1988年），頁512-516。段錫朋（1897-1948），字書詒、書貽，江西永新人。五四運動時任全國學生聯合會會長，1925年任武昌大學歷史系教授，1926年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秘書，1927年任國民黨江西省黨部執行委員。劉國銘主編，《中國國民黨百年人物全書》（北京：團結出版社，2005年），頁1780。

⁷ 洪軌，〈民國十六年江西四二事變回憶〉，《江西文獻》，第13期（1967年4月），頁7-15；鄭學稼，《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史》，第11冊（臺北：政大出版社，2019年），頁1-3。

在後來的江西政壇上仍被稱為AB團，但其實沒有組織，僅是派系。⁸ 此外，江西政治另有一大派系為「心遠系」，在江西教育界擁有相當基礎，代表人物是熊育錫，其曾任南昌心遠中學校長，並且長年參與江西的黨政活動。⁹ 心遠系亦不存在明顯組織，僅有人脈上的關係，而目前知曉1930年代活躍的幾個後起之秀，為程天放、李中襄及陳際唐，他們也與國民黨中央的CC系關聯甚深。隨著時局的發展，心遠系可大體視為中央CC系在江西的勢力延伸。¹⁰

時間來到1928年，AB團人士藉由南京國民黨中央實施的「黨務整理」政策，重新被派回江西黨務舞臺，主掌領導機關「江西省黨務指導委員會」，暫時取代省黨部的職權。面對代表南京勢力的黨務指導委員會，省政府內的改組派人士出面阻撓，造成黨政關係極其緊張。經過一連串黨政糾紛及黨中央祭出人事撤換後，江西黨務指導委員會在1929年才穩定展開黨務整理。¹¹ 同年，南京中央以魯滌平取代朱培德的省主席職位，省內改組派人士失去依靠而星散，黨政紛爭暫告一段落。¹²

為了進一步穩固江西黨務，掌控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的陳果夫派遣親信到江西，這些人皆為AB團領導人段錫朋的好友。很快的，江西AB團勢力在中央組織部的介入下逐漸壯大。1930年1月，江西黨務整理完成，召開第四次全省代表大會，成立第四屆省執行委員會與監察委員會，其中AB團人士占執監委數量的一

⁸ 國民黨的AB團與1930年代中共在蘇區肅反中打擊的所謂AB團並無關連，後者純為毛澤東為黨內派系鬥爭所捏造的產物。鄭學稼，《中共富田事變真相》（臺北：國際共黨問題研究社，1976年）；高華，〈肅「AB團」事件的歷史考察〉，《二十一世紀》，1999年8月號（1999年8月），頁60-70。

⁹ 心遠中學是江西近代史上頗負盛名的學校，先後培養的著名人物有程天放、彭學沛、桂永清、李中襄、方志敏、張國燾、夏征農、鄒韜奮等。

¹⁰ 某些回憶文獻中稱他們為心遠系，另有些直接視為CC系。

¹¹ 〈周利生等控贛省委李尚庸彭萬里〉，《政治檔案》，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以下簡稱「黨史館」）藏，典藏號：政/14.4。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國民黨年鑑：民國十八年》（出版地不詳：編者，出版年不詳），頁656-657。

¹² 魯滌平（1887-1935），字詠安，湖南寧鄉人。早年參與辛亥革命、護國護法之役。1925年任國民革命軍第二軍副軍長，後真除為軍長。1928年6月任湖南省政府主席，隔年4月任武漢衛戍司令，8月改任江西省政府主席。劉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第三冊（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0年），頁348-349。

半以上，剩餘的執監委則各有派系，無法團結起來與之抗衡。¹³ 是故，AB團在江西政壇東山再起。

江西省除了黨務領導層的頻繁變動，地方上也不甚安寧。中共勢力在江西境內廣泛紮根：方志敏、邵式平等在贛東與贛北地區，毛澤東、朱德等在贛西南地區。他們一方面擴大根據地，一方面在蘇區內部展開大規模的權力鬥爭及肅反，動搖地方社會基礎。¹⁴ 根據國民黨江西省黨部於1930年8月分的調查，江西八十多個縣中，有填報資料可供統計的67縣，因匪禍損失財產總計達3億8千多萬，焚毀房屋約8萬7千棟，被屠殺人數12萬8千人，難民161萬人。¹⁵ 許多地區的黨政事務僅能勉強維持現狀，抑或完全停頓。

1930年底，國民革命軍針對湘、鄂、贛等省分的中共勢力展開圍剿。1931年間，陷共縣分的國民黨黨務主管人員因參與剿共而犧牲者達四十餘人，而區以下幹部犧牲者則超過此數。如此艱巨之環境，使得黨務工作被視為畏途，加之地方經濟敗壞、財源枯竭，各縣黨務經費嚴重積欠，下級黨部人員難以維生。這些情形皆造成下層幹部日漸缺乏，黨務工作難以推進。¹⁶ 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為振興江西黨務，於1931年中旬派程天放、張道藩等人到江西，擔任「剿匪區域黨務指導委員」。¹⁷ 他們經過一番考察，認為江西黨務運作相當不健全：省黨部委員間存在AB團與熊育錫派之暗鬥，下級黨部則多被新式的土豪劣紳所把持。¹⁸

以上是1925-1931年間江西省的政治與黨務發展情況，可謂相當紛亂。除了派系因素，共禍的影響也使得整體環境的複雜性增加，整頓江西之困難令人望而

¹³ 陳貽琛，〈AB團與改組派在江西活動的見聞〉，收入政協江西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江西文史資料選輯》，總第9輯（南昌：編者，1982年），頁130-141。

¹⁴ 有關中共在江西蘇區的活動及權力鬥爭，論述甚多，此處僅舉郭華倫，《中共史論》，第三冊（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東亞研究所，1982年）。

¹⁵ 〈赤匪禍贛實況〉，收入羅家倫主編，《革命文獻》，第25輯（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70年），頁90-155。

¹⁶ 〈四全代會江西省黨務報告〉，《會議紀錄》，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以下簡稱黨史館藏），典藏號：會4.1/47。

¹⁷ 〈程天放等3委員指導處理江西各處剿匪區域之黨務案〉，《會議紀錄》，典藏號：會3.3/171.4。

¹⁸ 〈報告江西黨務情形〉，《會議紀錄》，典藏號：會3.3/178.33。

生畏。而熊式輝便是在這一時期來到南昌，首先擔任行營參謀長，而後任江西省政府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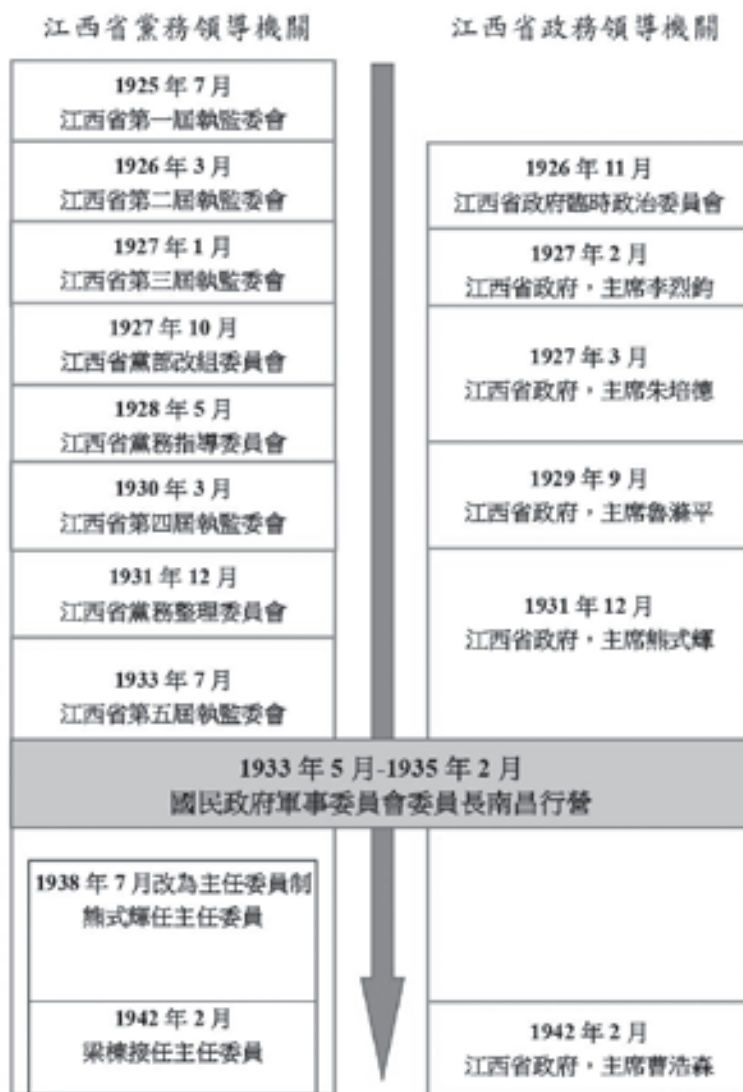


圖1、江西省黨政領導機關變遷圖（1925-1945）

資料來源：林養志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組織工作》，上冊（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3年）；傅伯言主編，《中國國民黨江西省地方組織志》（北京：團結出版社，2006年）。

二、初露鋒芒：膽識、機運與人脈

1926年北伐軍興，國民革命軍由廣東向湖南進發，主力軍的右側為孫傳芳勢力掌控的江西省，尚未直接成為戰場。熊式輝時任第三軍軍官學校教育長，他向總司令蔣介石建議進取江西，策略是由熊出面說服駐紮贛南的賴世璜部隊歸附，便可讓北伐大軍順贛江而下直取南昌。在建言獲得蔣介石採納後，熊式輝便秘密前往贛南。他與賴世璜曾是同學兼同僚，與賴所屬部隊官兵也大多為舊識，因此迅速地達成說項任務。於是，賴世璜的部隊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獨立第五師，隨即擴大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四軍，由賴任軍長，熊式輝任黨代表。其後，賴世璜留守贛州，由熊式輝代行軍長職，領軍北攻南昌，並陸續轉戰贛東、閩北、京滬、蘇州等地。¹⁹

在南昌克復後，江西方面成立「江西省政府臨時政治委員會」，主席為第三軍軍長朱培德，熊式輝被任命為委員之一。1927年3月，江西省政府成立，熊亦列名為省政府委員之一，然而他一直在外帶兵，並未涉足江西省政。另一方面，他因為向蔣介石建議進取江西並取得成功，對北伐局勢的進展有重大功勞，故獲得蔣的肯定與注意。但他畢竟不是蔣的嫡系，一時間並未受到重用，尚待一個機會。1927年8月，蔣介石下野，熊式輝致電蔣氏稱願同進退、追隨左右。經過一番努力表現忠心，熊在蔣心中的地位逐漸上升。²⁰ 1928年1月，蔣介石復職，即任命熊為淞滬衛戍司令。同年4月，熊式輝便辭去衛戍司令職，自願以總司令部參謀身分隨蔣介石繼續北伐。而後發生濟南慘案，熊擔任與日軍交涉之代表，與外交部部長黃郛共商對日方針。²¹ 黃郛在後來被認為是政壇上著名的「政學系」

¹⁹ 熊式輝著，洪朝輝編校，《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1907-1949）》（香港：明鏡出版社，2008年），頁83-85。

²⁰ 王又庸原作，李若松提供，〈楊永泰與熊式輝：對唐德剛教授「政學系探源」大文的一件補充資料〉，《傳記文學》，第64卷第2期（1994年2月），頁57-64；胡運鴻，〈我所知道的熊式輝〉，收入政協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 軍政人物（下）》（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頁1019-1031。

²¹ 熊式輝著，洪朝輝編校，《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1907-1949）》，頁89-91；吳相湘，〈熊式輝治軍行政外交〉，《民國百人傳》，第四冊，頁153-162。

要角，熊式輝與該系人物的連結，即始於此時。²²

北伐完成後，熊式輝奉調任第五師師長，並於1928年9月任淞滬警備司令。²³任內，與上海特別市市長張羣、中國銀行總經理張嘉璈等人過從甚密，這群人都日後被稱為政學系的核心人物。²⁴是故，上海時期是熊式輝擴大政治人脈並影響日後仕途的重要階段。同時，熊式輝對蔣介石的忠心，以及在軍事與政治上的才能，已經獲得蔣的充分肯定。根據相關回憶文獻，熊式輝之所以受到蔣的信任，其實還有一層結拜的姻親關係。熊式輝之妻顧竹筠曾拜宋美齡的母親做乾媽，因此顧家與宋家便加深了一層聯繫，宋美齡對熊式輝一家亦視為內親。²⁵

1930年，熊式輝奉蔣介石之命兼任「陸海空軍總司令行營」（以下簡稱「總司令行營」）參謀長。同年12月，熊氏與行營秘書長楊永泰一同搭機至南昌，不料飛機失事而受傷。²⁶空難過後，在醫院療養至隔年3月，隨後回家休養、復健。熊氏養傷期間，蔣介石經常前去探視。1931年6月中旬，熊再次啟程赴南昌就參謀長職。臨行前，蔣介石在南京總司令部召集同僚開會，並向眾人宣布「熊參謀長與諸君相處定能協洽，及此後一切皆由伊主持辦理」。²⁷可見其對熊式輝寄予之厚望。

²² 1929年1月，熊式輝邀黃郛、朱培德、邵力子等人共飲。當日黃郛在日記中記載：「蓋熊、朱、邵及我四人皆濟案中之同患難者，而我與熊、朱三人騎馬出南門之情況，至今回首思之，猶歷歷在目也。」黃郛著，任育德主編，《黃郛日記（1929-1930）》（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19年），頁2-3。

²³ 淞滬衛戍司令部於1928年4月改稱淞滬警備司令部。「蔣中正等呈國民政府」，〈保安機關組織法令案（一）〉，《國民政府》，國史館藏，典藏號：001-012071-00129-002。

²⁴ 有關政學系上層人士的互動，可參考金以林，《國民黨高層的派系政治（修訂本）》（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16年），頁508-546。

²⁵ 徐浩然，《蔣經國在贛南》（臺北：新潮社，1993年），頁38-39；胡運鴻，〈我所知道的熊式輝〉，收入政協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 軍政人物（下）》，頁1019-1031。

²⁶ 熊式輝著，洪朝輝編校，《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1907-1949）》，頁111。回憶錄中所提及之「南昌總司令部」，即為1930年冬在南昌成立的「陸海空軍總司令行營」。國防部史政局編，《剿匪戰史》，第二冊（臺北：國防部史政局，1962年），頁98。

²⁷ 熊式輝著，林美莉校註，《熊式輝日記1930-1939》，頁22、25。

在剿共的軍事體制下，作為軍事機關的總司令行營為統一號令，將權力延伸到地方黨政方面，俾達到一體化指揮。熊式輝抵贛後，首先即設計行營內部的兩個新機構：黨務委員會與政治委員會，其後又整合為「陸海空軍總司令行營黨政委員會」。他在日記中記錄，這個機構因為是從頭組織，事事都集中到他一人身上，甚至忙碌到整月都無暇書寫日記。²⁸ 1931年7月，黨政委員會成立，以蔣介石為委員長，曹浩森、程天放、魯滌平3人為委員，並設秘書處、黨務指導處、地方自衛處、地方政務處、考核處等5處，以及黨務與政治兩個設計委員會，由程天放兼任黨務設計委員會主任，魯滌平兼任政務設計委員會主任。²⁹

在行營黨政委員會的新制度下，將江西省內的43個縣劃為剿共區，統一由該委員會來管轄區內的政治與黨務。而剿共區內再劃分為9個區，各區設立黨政委員會分會，就近處理所轄各縣之黨政諸務。³⁰ 簡而言之，這43個縣便不歸江西省政府與省黨部管理。此外，剿匪區內的各縣，由縣長充任縣黨政委員會委員長，並暫停縣黨部的運作。這些制度上的變動，似乎使江西省黨部頗有微詞，因其原本管有的縣分超過半數被分割了出去。³¹

在行營黨政委員會這一具有實際權力的機構中，程天放及其「心遠系」積極發揮作用，開始與原本掌握省黨務的AB團爭取權力。儘管AB團的段錫朋也擔任黨政委員會黨務指導處處長，但程天放在體制上的位階比他高，所以有更多運籌帷幄的空間。程氏不但直接任命自己的親信進入黨務指導處任職，還主導黨政委員會所轄縣分的人事布局。這些情形使段錫朋無法忍受，不久便辭去黨務指導處處長一職，離開南昌。³²

²⁸ 熊式輝著，林美莉校註，《熊式輝日記1930-1939》，頁26。

²⁹ 錢端升等著，《民國政制史》（上海：上海書店，1989年），頁141；劉治乾主編，《江西年鑑》（南昌：江西省政府統計室，1936年），頁113。行營黨政委員會的人事安排，可見〈贛匪區黨政委員會 蔣主席自兼委員長〉，《民國日報》，上海，1931年7月2日，版6；〈黨政委員會分會區域確定〉，《江西民國日報》，南昌，1931年7月3日，版6。

³⁰ 〈總司令行營設立黨政委員會劃江西為九個剿匪區〉，《會議紀錄》，典藏號：會3.3/175.11。

³¹ 〈報告江西黨務情形〉，《會議紀錄》，典藏號：會3.3/178.33。

³² 陳貽琛，〈AB團與改組派在江西活動的見聞〉，收入政協江西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江西文史資料選輯》，總第9輯，頁130-141。

目前有關熊式輝在總司令行營參謀長任內活動的紀錄極少，但從其規劃的黨政委員會制度來看，對剿共下的黨政體制設計有開創性的意義，更可視為後來南昌行營（1933-1935）體制的濫觴。同時，他作為制度設計者，充分瞭解此體制將引伸出的權力分配問題，又能見到程天放與段錫朋的爭執過程，故對於組織與權力的交互關係，勢必產生深刻的體會。而從人事上來看，黨政委員會內的部分職員，也在後來成為熊式輝主掌江西省政的班底，詳見後述。

在第三次圍剿期間，九一八事變爆發，蔣介石為團結黨內各派而決定下野，並提前做出重要的人事部署。³³ 1931年12月中旬，蔣召熊式輝談話，指出其準備改組江蘇、浙江兩省省政府，並要求熊主掌浙江省政。這兩個省分為國民政府統治區域的核心，蔣介石又言：「君宜赴浙擔任省政，我返奉化休息」。由此可見熊式輝在其心中的地位。然而熊卻力辭，自認無法擔當重任。他向蔣介石陳說，若堅持要讓他出掌省政，不如讓他回贛服務桑梓，拯救被匪患蹂躪的江西。蔣聽了熊式輝的一番話後表示同意，惟當時江西省政府主席是魯滌平，故還需要徵求其意見。隨後，熊式輝找魯滌平討論，後者同意讓賢。於是在12月15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議，由熊式輝接任江西省政府主席。³⁴ 魯滌平則轉任浙江省政府主席。

叁、抗戰前的權力發展與人事格局

一、黨政關係：強人之姿抑制黨務

在國民黨的訓政體制架構下，黨權始終是權力核心的象徵，中央以黨領政而地方政治同時存在黨務與政務兩種體系，儘管在制度上是平行的，但實際的黨政關係運作在不同地域的差別甚大，其中江西的情形又特別複雜。熊式輝自願出掌省政，儘管已有心理準備，但身為一位與江西既有政治環境無甚瓜葛的新任省政府主席，要如何在複雜的政壇中站穩腳跟，注定會是一個不平凡的歷程。

³³ 金以林，《國民黨高層的派系政治（修訂本）》，頁375-376。

³⁴ 熊式輝著，洪朝輝編校，《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1907-1949）》，頁117-118。

1931年12月，就在熊式輝就任江西省主席的同時，國民黨中央將6月間派出的剿匪區域黨務指導委員程天放等人撤回，一併取消總司令行營黨政委員會，並重行規劃江西的黨務領導機構：派遣7人為江西省黨務整理委員，組織「江西省黨務整理委員會」，取代第四屆省執監委員會之職權。³⁵從黨務整理委員名單來看，除了熊式輝外，CC背景的人物（包含心遠系）占大多數，一夕之間便讓原本掌握省黨部的AB團居於劣勢。³⁶

黨務整理委員會成立後，擬定全省黨務方案，著手改組各縣市黨部，重整地方黨務。至1932年12月，經整理已正式成立之縣市黨部有五十餘處，並經中央核准，準備召開第五次全省代表大會。³⁷有回憶文獻指出，此次黨務整理的細節，是透過黨員總登記，排斥地方上有AB團背景的黨員，將基層黨務權力洗牌。³⁸於是，江西省的黨務權力移轉到CC系手中，而熊式輝雖然參與了黨務整理，但尚未能在黨務方面建立自己的系統，仍是單打獨鬥。

據江西黨務人士回憶，熊式輝主持江西省政後不久，因想要制約省內黨務人士的權力，與黨中央掌控組織人事的陳果夫和陳立夫兄弟發生齟齬。不久後，有CC系人士在南京鼓動輿論，抨擊熊式輝「以政領黨」。1932年初，熊式輝至南京開會，CC系人士策動旅居寧滬的江西同鄉散發傳單，呼籲蔣介石撤換熊式輝。熊氏見此情形頗為窘困、心生不悅，乃決心壓制省黨部內的CC系。³⁹

1933年5月，國民黨江西省第五次全省代表大會召開。經過選舉及中央圈定後，選出的江西省第五屆執行委員為王冠英、李中襄、劉家樹、蘇邨圃、俞百

³⁵ 〈關於江西省黨務整理案〉，《會議紀錄》，典藏號：會4.3/21.6。

³⁶ 江西省黨務整理委員為王冠英、范爭波、劉家樹、熊式輝、陳劍修、李中襄、羅時實。陳貽琛，〈AB團與改組派在江西活動的見聞〉，收入政協江西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江西文史資料選輯》，總第9輯，頁130-141。

³⁷ 〈中國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委員會工作報告〉，收入林養志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組織工作》，上冊（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3年），頁379-457。

³⁸ 陳貽琛，〈AB團與改組派在江西活動的見聞〉，收入政協江西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江西文史資料選輯》，總第9輯，頁130-141。

³⁹ 張任石，〈國民黨江西各派系的鬥爭〉，收入政協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 政府·政黨》（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頁157-166。

慶、黃強、譚之瀾；監察委員為熊式輝、熊育錫、熊在渭、甘家馨、孔紹堯。⁴⁰這一屆的省黨部，由CC系占優勢，尤其3位常務委員王冠英、李中襄、劉家樹皆為CC系在江西的主要幹部。⁴¹而熊式輝雖擔任省監察委員，但明顯難與CC系抗衡。於是，他安排心腹胡運鴻為省黨部書記長，以確保對黨部方面的掌握，防止省政被干涉。⁴²

隨著剿共局勢的變化，熊式輝又有制約省黨部的新方法。1933年5月，蔣介石為準備第五次圍剿，成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以下簡稱「南昌行營」），其職責是「處理贛、粵、閩、湘、鄂五省剿匪軍事及監督指揮剿匪區內各省黨政事務」。⁴³於是，南昌行營在黨務上成為介於中央黨部與剿匪區省黨部之間的指揮單位，在政務上則成為行政院與剿匪區省政府之間的樞紐，這種以軍事機構統領黨政事務的模式，是1931年行營黨政委員會體制的進一步強化，成為剿共戰爭體制下黨政軍一體化指揮的核心機構。

南昌行營的內部組織，起初較為龐雜，並未按照組織大綱的規定設置，直到1933年10月下旬才精簡化。簡化後的組織如下：（一）設委員長辦公廳，置正副主任各一人、秘書長一人，下設文書、人事、機要、調查四課。辦公廳主任為熊式輝，秘書長為楊永泰。（二）設第一、第二兩廳，各設廳長一人，受辦公廳主任或秘書長指導。第一廳廳長兼參謀長為賀國光，第二廳廳長由楊永泰兼任。（三）設審核處、訓練處、經理處、總務處。⁴⁴

⁴⁰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國民黨年鑑：民國二十三年》（出版地不詳：編者，1934年），頁157。

⁴¹ 劉不同，〈國民黨的魔影——CC團〉，收入政協全國委員會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合訂本）》，第16卷（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1年），頁159-174。

⁴² 胡運鴻原為國民革命軍第五師特別黨部秘書，是熊式輝精心培養的人馬。胡靜如，《爐餘掇拾（上）》（臺北：龍文出版社，1994年），頁33；〈胡運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國史館藏，典藏號：129-010000-4818。

⁴³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組織大綱」（1933年6月24日），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 第五輯第一編軍事》，第一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頁26-28。（以下簡稱〈南昌行營組織大綱〉）

⁴⁴ 〈南昌行營組織大綱〉；謝藻生，〈我所知道的南昌行營〉，《世紀行》，第1期（1995年1月），頁36-39；林緒武，《從政學會到新政學系：國民黨體制內的資產階級自由派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203-205。

南昌行營不但有權指揮剿匪省分的黨政事務，更於1933年7月下達訓令，要求這些省分依照日前公布之《豫鄂皖剿匪區內暫行黨務整理綱要》改制地方黨務，撤銷各縣市黨部原任人員，一律改派幹事、助理幹事負責當地黨務工作。⁴⁵經費方面，1933年8月起停止江西各縣市黨部經費，一律改由行營於每月發給事務費，而省黨部經費亦自1934年起不再由省庫支付。⁴⁶由此情形來看，行營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剛成立的江西省第五屆省黨部之權力，並且打算直接更動地方各縣黨務人事，還透過經費的撥發來加強掌控地方黨務。這便是熊式輝利用行營的特殊權力壓制省黨部CC系的一著棋。

如此重大的變化，令江西省黨部感到錯愕，於是他們致電中央執行委員會，指出剿匪期間人力吃緊，若各縣黨部只派幹事和助理幹事，恐無法應付地方動員任務，且如此改制並不符合國民黨總章。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回函則稱，援用豫鄂皖綱要及停縮經費，是為了整飭黨務、便利剿匪，且為委員長之指令，業已由中常會核準備案，應即遵辦。⁴⁷

相關回憶也指出，熊式輝利用行營掌控的經費權，使江西省縣市黨部經費緊張。許多中層黨務人員生活困難，只得另謀出路，前往省政府主辦的政治講習院受訓，後被分發至各地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和縣政府工作。熊的這一策略，成功使政府部門職位的吸引力高於黨職，同時在省政方面廣納人才，以打破派系鴻溝。⁴⁸而從檔案來看，江西省地方黨部經費困難的狀況甚至持續到1938年1月，江西縣級黨部的每月事務費，其總額（來源包含行營穩定發下的每月9千元，以及省黨部經常補助1,020元。）經平均分發後，到各縣黨部手上的數額極少。「本省各縣黨部事務，多者百餘元，少僅數十元。經費竭蹶，可見一斑」。⁴⁹

⁴⁵ 劉治乾主編，《江西年鑑》，頁114；〈豫鄂皖剿匪區內暫行黨務整理綱要〉，《江西省政府公報》，第57期（1933年7月），頁3-4。

⁴⁶ 〈採用豫鄂皖剿匪區內暫行黨務整理綱要整理贛省縣市黨務案〉，《會議紀錄》，典藏號：會4.3/98.18。

⁴⁷ 〈江西省執監委會上中執會電〉，《會議紀錄》，典藏號：會4.3/99.18。

⁴⁸ 張任石，〈國民黨江西各派系的鬥爭〉，收入政協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 政府·政黨》，頁157-166。

⁴⁹ 〈江西省黨部工作概述〉，《特種檔案》，黨史館藏，典藏號：特6/20.2。關於戰時黨務經費撥發的問題，待進一步詳細研究。

熊式輝以強人之姿抑制省內CC系，為的是降低省黨部對省政的影響，但也絕不至於讓黨部毫無用武之地，畢竟在剿共與農村復員的重大使命中，各級黨部也必須發揮表率作用。所以只要界線劃分清楚、各司其職，不影響到熊的權威，那麼江西的政治舞臺仍然對不同派系開放。曾任江西省黨部職員的張任石回憶，熊願意容納國民黨內各個派系在江西活動，唯一的條件就是聽他的話，不可另起一套。⁵⁰ 另有回憶稱，熊對於中央派來江西考察黨務的大員並不買帳，態度是井水不犯河水、各自為政：「江西當時的勢力可以說是整個掌握在熊式輝手上，很多老前輩來做事，都摸著鼻子回去。熊表面上客客氣氣，實際上的作為卻讓人沒法子相處。」⁵¹

當然，就實際層面來看，熊式輝在江西政壇還算後起之秀，若不是蔣介石的有意提拔、委以重任，以江西複雜的政治環境來說，掌權之路恐怕會走得更为艱難。另一方面，正是因為熊在主政江西期間盡可能將權力掌握在自己手中，才得以較無阻礙的在江西推行新政，尤其是剿共時的行政制度改革（諸如行政督察專員制度、保甲制度、省政府合署辦公、縣分區設署等），以及農村復員各類建設的推動。

1934年底，第五次圍剿結束，隔年南昌行營也隨之撤銷，江西省黨務回歸第五屆省執行委員會負責，地方黨務工作也逐漸脫離剿共軍事的影響。⁵² 1935年7月，時任江蘇省主席的陳果夫致電蔣介石，指出江西省黨部內諸同志希望能參與省政府委員職務，且聽聞省府似有局部改組之消息，希望由蔣提拔一至二人進入省政府。然而蔣介石的回覆是，江西省政府目前並無改組之說，僅有民政廳廳長要改易，但其人選應由熊式輝自行物色。⁵³ 可見蔣在江西省政的人事布局上，留給熊式輝相當大的空間，黨部領導層想涉足省務並不容易。而該次民政廳長的人事異動，最後是由政學系幹部王又庸接任，維持熊式輝統治群體的優勢。

⁵⁰ 張任石，〈國民黨江西各派系的鬥爭〉，收入政協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 政府·政黨》，頁157-166。

⁵¹ 陳存恭、潘光哲訪問，潘光哲紀錄，《劉象山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頁13-14。

⁵² 〈擬訂改進江西省黨務辦法案〉，《會議紀錄》，典藏號：會4.3/178.13。

⁵³ 「陳果夫電蔣中正」（1935年7月6日），〈一般資料——民國二十四年（三十八）〉，《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0236-074。

根據黨政人士的回憶，1936年江西省黨部曾出現人事上的不協調，省黨部內雖多為CC系，但彼此間也有分派。3位常務委員互相爭權，並且排斥外來人，對於監察院派赴江西的監察使苗培成亦有所反對。當時，中央曾欲將江西省黨部改為主任委員制，派遣中央監察委員姚大海擔任主委，但原本的常務委員感到不滿，最後竟透過塑造輿論，聯合熊式輝一致對外，成功阻止姚的上任。⁵⁴ 詳細過程目前尚未能從檔案中加以印證，但以熊式輝善於合縱連橫的政治性格來看，此番敘述亦在合理範圍。事實上，熊式輝對於省黨部內部同室操戈的情形，也曾感到惋惜，並且思考解決辦法。⁵⁵

綜合上述，戰前江西省的黨政關係，呈現出明顯的傾斜狀態。熊式輝在黨務制度上雖然只兼任省黨部監察委員，但其透過南昌行營黨政軍權一體化領導的新制，將權力凌駕於省黨部，抑制CC系的勢力，令其無法干涉省政。而南昌行營撤銷後，省黨務權力雖然回歸省黨部，但CC系人士彼此間並不協調，經費的拮据現象也仍然持續，黨務發展相當有限。

二、省政核心幹部分析

熊式輝就任省主席後，曾主張「贛人治贛」。該口號的背景，是1920年代初江西出現的自治運動風潮，社會輿論反對北京政府任命的軍人治贛，當時的江西省議會亦向中央要求民選省長。而「贛人治贛」的口號便在那時見諸報章，一時頗具聲勢。⁵⁶ 熊式輝以江西子弟擔任省主席，可謂呼應了江西鄉親多年來的期待。此外，他在上任之初便將這一口號加以闡揚，提出新的見解。他認為，此屆省政府委員雖多為江西人，但少數人的能力畢竟有限，真正的「贛人治贛」端看3千萬江西民眾能否群策群力，共同建設新江西。⁵⁷ 這番見解，將新任省政府與

⁵⁴ 陳存恭、潘光哲訪問，潘光哲紀錄，《劉象山先生訪問紀錄》，頁14-15。

⁵⁵ 熊式輝著，林美莉校註，《熊式輝日記1930-1939》，頁113-114。

⁵⁶ 〈贛人治贛之熱烈運動〉，《民國日報》，上海，1920年12月24日，第二張版6；何友良編，《江西通史》，第一冊，頁83-88。

⁵⁷ 熊式輝，〈贛人治贛的真精神〉，收入贛政十年編輯委員會，《贛政十年》（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41年），頁6-7。

江西民眾擺在同一起點，凸顯其施政團隊的親民態度。

觀察熊式輝的用人，確實不侷限在江西本省，他一方面看重下屬的才識與能力，另一方面則透過不同層次的人脈網路來舉用幹部。以下考察熊式輝主政江西時期的省政核心幹部，探索其背景、經歷以及與熊的關係。

表1、江西省政府委員及廳處長任期表（熊式輝主政時期）

省政府委員 兼主席	省府委員兼 民政廳廳長	省府委員兼 財政廳廳長	省府委員兼 教育廳廳長	省府委員兼 建設廳廳長	其他曾 任省政 府委員 者	省政府 秘書長
熊式輝 (1931.12- 1942.2)	1.熊式輝 (1931.12-1933.9) 2.朱懷冰 (1933.9-1934.3) 3.呂 咸 (1934.3-1935.6) 4.王又庸 (1935.7-1935.10) 5.王次甫 (1935.10-1946.5)	1.吳健陶 (1931.12-1936.1) 2.劉體乾代理 (1936.1-1936.9) 3.文 羣 (1936.9-1945.11)	1.陳劍脩 (1931.12-1932.9) 2.沈士遠 (1932.9-1933.2) 3.程時燿 (1933.2-1946.5)	1.龔學遂 (1931.12-1935.12) 2.李德釗代理 (1935.12-1936.7) 3.龔學遂 (1936.7-1937.7) 4.熊式輝代理 (1937.7-1938.9) 5.楊綽庵代理 (1938.9-1939.10) 6.楊綽庵 (1939.10-1943.11)	熊育錫 熊 遂 袁 良 蕭純錦 劉體乾 邱 椿 胡家詔 胡家鳳	1.周介禔 (1931.6-1932.7) 2.劉體乾 (1932.7-1940) 3.胡家鳳 (1941.1-1945.11)

說 明：表格內姓名下方括弧為任期之年月。

資料來源：許師慎，〈江西省政府職官表〉，《江西文獻》，第99期（1980年1月），頁32-37。

民政廳掌管縣長任免、地方自治、治安等項政務，有舉足輕重之地位。熊式輝在任省主席之初，曾自兼民政廳廳長，其後該職位又歷經朱懷冰（原任南昌行營第四廳廳長）、呂咸、王又庸、王次甫。其中，王又庸與王次甫是熊式輝手下的得力幹將，亦被視為熊式輝統治集團的重要人物。王又庸（1891-1963），江

西興國人，是早年政學會成員王有蘭的胞弟，與楊永泰關係密切，並在南昌行營成立後擔任第二廳（廳長為楊永泰）第一組組長，負責保衛、清鄉、感化、民眾組織訓練、收復區特種教育等業務。南昌行營實施「政治剿匪」的相關辦法及法令，多由王又庸及同僚研擬。⁵⁸

王次甫（1893-1962），湖南臨澧人，起初透過商震引介而結識楊永泰，並先後被楊永泰安排在河南省與四川省擔任行政督察專員。1935年，楊永泰欲調王又庸到四川擔任民政廳長，取得熊式輝同意後，推薦王次甫接任贛省民政廳長。王次甫與熊式輝雖素不相識，但因懂得揣摩熊的心理，頗受賞識，持續擔任民政廳長至戰後。⁵⁹

財政廳為省務經費的主管機關，長期剿共的江西，省財政的籌措與分配儼然是重中之重。熊式輝任內，先後有吳健陶與文羣兩位財政廳廳長，此二人彼此關係匪淺。文羣（1884-1969），為江西萍鄉人，早年在日本攻讀法政經濟，民國初年參與政學會，北伐前便擔任過江西省財政廳長。⁶⁰ 吳健陶（1886-1952）為江西金谿人，曾任文羣的秘書。⁶¹ 1931年，文羣與吳健陶進入行營黨政委員會，任政務設計委員會委員；文羣又兼任地方賑濟處處長，並招吳健陶在手下任參事，兩人在這一時期與行營參謀長熊式輝產生行政上的隸屬關係。熊式輝的省政府成立後，文羣保薦吳健陶任財政廳廳長，自己則任省政府委員兼江西省農村合作委員會委員長，主辦農村合作事業，頗具成果。⁶² 南昌行營成立後，文羣任第二廳第二組組長，主管賑濟、收容、封鎖、屯墾、農村善後等業務。行營對剿匪

⁵⁸ 王又庸原作，李若松提供，〈楊永泰與熊式輝：對唐德剛教授「政學系探源」大文的一件補充資料〉，《傳記文學》，第64卷第2期（1994年2月），頁57-64；〈南昌行營組織大綱〉。

⁵⁹ 王邦范，〈王次甫與政學系〉，收入政協江西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江西文史資料選輯》，總第12輯（南昌：編者，1983年），頁154-161。

⁶⁰ 劉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第四冊，頁15-17。

⁶¹ 〈吳健陶〉，《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典藏號：129-050000-2072。

⁶² 臺北市江西同鄉會編，《江西近代鄉賢錄》（臺北：臺北市江西同鄉會，1998年），頁35-36；陳貽琛，〈五次「圍剿」中的「七分政治三分軍事」見聞〉，收入政協江西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江西文史資料選輯》，總第14輯（南昌，編者，1984年），頁113-134。

區的經濟封鎖，也多由文羣負責規劃並執行。⁶³ 1936年起，財政廳廳長改由文羣接任，並一路當到1945年底。根據曾與文羣共事之人的回憶，其對於省政府所需的糧政經費及政令宣傳經費從不留難，與熊式輝配合得相當好。⁶⁴ 其因此被視為熊式輝統治集團的重要幹將。

建設廳廳長龔學遂（1895-1968），為江西金谿人，擅長交通建設業務，自1930年12月任江西省建設廳長，是唯一一位任期橫跨魯滌平、熊式輝兩位省主席的廳長。1931年兼任行營黨政員會政務設計委員會委員，1934年又兼南昌市市長。江西省在整個剿共期間的交通建設與運輸規劃，皆由龔氏掌理。⁶⁵ 第二任廳長楊綽庵（1895-1955），福建福州人，早年投身郵務與稅務工作，1932年任廣西省統計局局長，1936年經友人介紹而結識楊永泰，頗受楊的賞識，隨即進入湖北省政府任職。楊永泰被刺逝世後，又經王又庸等友人延介，赴江西省政府任建設廳秘書主任，並在抗戰期間升任廳長，主持各項工業與交通建設，頗具佳績。⁶⁶

省政府秘書長劉體乾（1880-1940）為福建閩侯人，保定軍校出身，特別擅長行政業務，成為受熊式輝倚重的幕僚長。⁶⁷ 在南昌行營成立後，劉體乾兼任行營審核處處長，掌理「審核各機關工作報告及會計事項」。而根據曾任審核處秘書的謝藻生回憶，該處負責審核10個省政府、3個特別市的人事經費，職權相當大。⁶⁸ 1936年，劉氏任江西省政府委員，並繼續兼任省府秘書長，直到1940年逝世。其後，熊式輝派胡家鳳繼任省政府秘書長。胡家鳳（1886-1962）為江西南昌縣人，早年從事教育工作，1930年任青島市政府秘書長，市政建設成績卓

⁶³ 〈南昌行營組織大綱〉；王又庸原作，李若松提供，〈楊永泰與熊式輝：對唐德剛教授「政學系探源」大文的一件補充資料〉，《傳記文學》，第64卷第2期（1994年2月），頁57-64。

⁶⁴ 方鵬程，〈文羣先生史事專訪〉，《近代中國》，第35期（1983年6月），頁213-216。

⁶⁵ 〈龔學遂〉，《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典藏號：129-050000-1877。

⁶⁶ 常存真撰，楊文麒校，〈前江西省建設廳長楊綽庵先生傳〉，《江西文獻》，第145期（1991年7月），頁41-45。

⁶⁷ 胡靜如，《爐餘掇拾（上）》，頁13-14；田原天南編，《清末民初中國官紳人名錄》（臺北縣：文海出版社，1996年），頁687。

⁶⁸ 〈南昌行營組織大綱〉；謝藻生，〈我所知道的南昌行營〉，《世紀行》，第1期（1995年1月），頁36-39。

越。⁶⁹ 熊式輝素聞胡家鳳有才，曾兩度延攬其進入省政府，惟皆未如願。⁷⁰ 直到抗戰期間，才成功將其納入省政幹部行列。

省政府委員或各級幕僚中，亦有熊式輝擔任淞滬警備司令時的僚屬。如省府委員李德釗與參事彭醇士，二人均曾任行營黨政委員會的政務設計委員會委員。⁷¹ 根據相關憶述，省府參事符鼎升、出納股長邵德、議事股長吳承昌等人也都是熊式輝在上海時期的部屬，這些人形成了江西省政府中的「上海派」；而省府秘書長劉體乾在秘書處內引用了一些福建同鄉，被視為「福建派」。兩派人馬不太和諧，熊式輝則善於利用這種關係讓雙方相互監督。⁷²

綜觀以上幾位省政幹部與熊式輝的關係，首先應注意的是1931年成立的行營黨政委員會，該機構作為熊式輝接觸剿共事務與江西政治的第一步，也成為他物色人才的重要園地。有回憶即指出，行營黨政委員會的成員絕大多數是楊永泰與熊式輝的人，後來成立的江西省政府也容納不少原班人馬，施政大體沿襲相同路線。⁷³ 故分析熊式輝在江西的人事結構，不能忽視黨政委員會這一關鍵時期。

接著，在上述複雜的人際網路中，存在一位樞紐人物，即楊永泰（1880-1936）。楊氏政治經驗豐富，出謀劃策能力之優秀，深得蔣介石青睞，是蔣在1930年代極為器重的幕僚。⁷⁴ 熊式輝與楊永泰初識的時間尚不明確，但兩人在經

⁶⁹ 臺北市江西同鄉會編，《江西近代鄉賢錄》，頁47-49。

⁷⁰ 「熊式輝電蔣中正」，〈一般資料——民國二十二年（二）〉，《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200-00072-151。「熊式輝電楊永泰」，〈一般資料——民國二十二年（四十五）〉，《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200-00115-016。

⁷¹ 李德釗曾在淞滬警備司令部任經理處處長，後成為熊式輝秘書。熊在1930年飛機失事負傷時，李曾親往慰問並向外界說明傷勢。〈熊楊昨日傷狀〉，《新聞報》，上海，1930年12月17日，第四張。彭醇士曾任淞滬警備司令部總辦公廳主任，參贊機要，獲熊式輝賞識。臺北市江西同鄉會編，《江西近代鄉賢錄》，頁108-112。

⁷² 徐樹壖，〈熊式輝踞贛十年的點滴見聞〉，收入政協江西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江西文史資料》，總第2輯（南昌：編者，1980年），頁63-72。

⁷³ 陳貽琛，〈五次「圍剿」中的「七分政治三分軍事」見聞〉，收入政協江西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江西文史資料選輯》，總第14輯，頁113-134。

⁷⁴ 楊永泰，廣東茂名人，畢業於北京法政專門學校，宣統元年任廣東省諮議局議員，民國元年任臨時眾議院議員，並加入國民黨。民國初年長期參與議會活動，並與李根源同為政學會重要人物，亦曾任廣東省財政廳長、廣東省長等職。北伐期間為蔣介石獻策，全國統一

歷飛機失事意外後，從此結為患難之交。在總司令行營時期，楊任秘書長、熊任參謀長，兩人一拍即合。到了南昌行營階段，楊任秘書長，熊任辦公廳主任，更是合作無間。在政治上，兩人合力掌控剿匪省分的行政與黨務大權，推動多項新制度，透過行營將權力延伸到剿匪之外的其他政務。在人事安排上，熊式輝經過楊永泰的推薦，將王又庸、王次甫、文羣等幹將引入麾下，而這群政學系中層幹部也相互援引，來到江西政壇，為熊開創贛政十年的穩固統治。故此，若論何人對熊式輝的江西政治經驗影響最深，非楊永泰莫屬。⁷⁵

三、整頓地方軍事力量

江西省在北京政府時期乃至北伐告成後，地方上普遍存在許多武裝團體或零星部隊，名目不一、各自為政。熊式輝就任省主席後，即著手整編這些武裝力量，目的是統一號令、維持社會治安，並用以協助剿共軍事。1933年，南昌行營頒布《整理江西各縣自衛團隊計劃綱要》，除部分地區之情形特殊外，統一將整編的武裝力量稱為保衛團。當然，地方武裝的問題並非江西獨有，而是普遍存在於各省，於是南昌行營於1934年5月起進一步整理剿匪區內各省之民團，將保衛團一律改為保安團，團隊經費及官佐考核、委任等事宜，統一由各省政府保安處統籌。⁷⁶同年6月，楊永泰在南昌行營召集的各省保安單位會議上，指出：「已往之保衛團是屬於區，屬於鄉，屬於鎮的，甚至還有屬於一村一姓的，完全是一種零碎分割的狀態，都把持在土豪劣紳的掌握中，地方官吏無法過問，自從前年整理民團條例頒布

後成為蔣的謀士。其政治經歷，可見唐德剛，〈政學系探源〉，《傳記文學》，第63卷第6期（1993年12月），頁21-30；劉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第三冊，頁267-268。

⁷⁵ 1936年10月，楊永泰於漢口被刺殺，熊式輝曾致贈輓聯：「職大體，有擔當，輔弼悼長才，後起難繼。據上游，資控馭，憂勤定危局，自愧不如。」請參見熊式輝著，洪朝輝編校，《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1907-1949）》，頁218。1947年，楊永泰家屬欲為其成立一所紀念醫院，熊式輝得知後當即允諾協助。Diary, January 23, 1947, Box 4, Shihui Xiong papers,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 Columbia University Library.（以下將熊式輝未刊日記簡稱為「《熊式輝日記》手稿本」）。

⁷⁶ 劉治乾主編，《江西年鑑》，頁453。江西省政府整編保安團隊之沿革，以及訓練、徵兵、參與剿共及抗戰的情形，詳見廖士翹，〈十年來之江西保安〉，收入贛政十年編輯委員會編，《贛政十年》（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41年），頁22-23。

以後，這種四分五裂，彼疆此界的紛亂情形，才漸漸打破，漸漸改善，一切編制、訓練、調遣、人事、經理纔漸漸的能統一於縣。」⁷⁷

在指揮機構方面，省保安司令部在名義上負責統帥各保安團，而省政府設有保安處作為參謀機構，是真正掌握指揮權的部門。熊式輝兼任江西省保安司令，他在軍事部門的人事安排上，一方面任用近親故舊，一方面特別舉用有保定軍官學校及日本陸軍士官學校背景的軍人。有回憶指出，熊因畢業於保定及日本陸大，對軍事學問頗為自負，故看不上黃埔軍校畢業生。⁷⁸ 省政府保安處處長廖士翹，畢業於保定軍校及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保安處參謀長熊濱是熊式輝的姪子，也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後轉任副處長。保安處第二科科长鄧警銘，曾任淞滬警備司令部偵緝隊隊長，為熊式輝辦理情報工作。保安司令部直屬的幾個保安團團長，也與熊式輝有親戚故舊關係，如第一團團長黃新富是熊式輝的外甥女婿，第二團團長曾戛初是國民革命軍第五師老幹部，兩人都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出身。⁷⁹

熊式輝將親戚故舊安排在重要的軍事職位上，一方面鞏固人事與指揮權，一方面讓自己的整軍構想得以貫徹。如1934年1月，熊面見廖士翹、熊濱等人，要求他們加速訓練各保安團隊、擬具演習計畫。同時指示訓練要點：不但要著重士兵的精神、體力、紀律、技能，也要讓長官有肩負責任的自覺。⁸⁰ 不過，整頓地方軍事力量並非一蹴而就，在熊逐步集中軍權的過程中，也面對不少挑戰，主要可分成兩種情形，一是派系問題，二是地方武裝勢力之複雜。

剿共期間的江西是軍事重鎮，許多黃埔系人士隨著形勢的發展，將勢力延伸到此地。1932年，滕傑、賀衷寒、康澤、鄧文儀、戴笠等黃埔出身的青年軍官，為了挽救民族危難、凝聚青年政治力量，並擁護蔣介石領導，於是建立了一種三層體系的組織。最上層為三民主義力行社，為領導核心；中層為革命青年同志會

⁷⁷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編輯部編，《南昌行營：政治工作報告（一）》（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0年），頁88-89。

⁷⁸ 張任石，〈國民黨江西各派系的鬥爭〉，收入政協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 政府·政黨》，頁157-166。

⁷⁹ 胡靜如，《燼餘掇拾（上）》，頁29、49。

⁸⁰ 熊式輝著，林美莉校註，《熊式輝日記1930-1939》，頁42。

與革命軍人同志會；基層則為中華復興社。⁸¹ 該組織體系一般稱為復興社，而相關回憶文獻在強調領導成員活動時則多以力行社稱呼，實則同為一體。⁸²

復興社對於打進江西地方軍事體系抱有相當野心，然而人事權與指揮權被熊式輝牢牢抓在手中，外人不易發揮影響力。根據曾在省政府秘書處及保安處任職的胡靜如回憶，當時由中央分發至江西的黃埔軍校學生，很難進入江西省保安團隊的系統，後來軍事委員會曾指定江西整編兩個保衛師，並派兩位黃埔一期畢業生擔任師長，然而他們到任後不久，就被熊式輝以整編保安團隊的名義，把該建制取消了。⁸³

儘管如此，復興社人士還是善用機會，爭取空間。南昌行營成立後，委員長侍從秘書鄧文儀兼任行營秘書處調查課課長。該單位的權責頗大，擁有諸多幹部與經費，主要職責是彙整徐恩曾的黨務情報與戴笠的軍事情報，供統帥及幕僚長參考。該單位還有一個特殊權力，就是在剿匪區各省的省政府保安處內增設情報部門，由調查課直接指揮監督，形成一個緊密的情報網。⁸⁴ 胡靜如在回憶中便指出，省府保安處所屬之諜報股，其負責人在制度上必須由軍統局推薦任用，即戴笠的人馬。於是，復興社人士便從這個單位開始，爭取其他保安處職員向復興社靠攏，或處處施以監視。⁸⁵

由於當時蔣介石在軍事情報及訓練方面頗倚重復興社人士，所以熊式輝也不便阻止復興社透過上述方法滲透至省府保安處。此外，復興社在南昌的主要刊物《掃蕩日報》經常批評江西省政府，熊式輝曾幾次向蔣介石抱怨，然而最後都不

⁸¹ 有關復興社組織與活動的論述，詳見鄧元忠，《國民黨核心組織真相：力行社、復興社，既所謂「藍衣社」的演變與成長》（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0年）；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型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頁282-290。

⁸² 力行社首任書記滕傑，對力行社的組織模式解釋得最為詳盡，見滕傑口述，勞政武編撰，《從抗日到反獨：滕傑口述歷史》（桃園縣：淨名文化中心，2014年），頁124-131。

⁸³ 胡靜如，《燼餘掇拾（上）》，頁29。

⁸⁴ 鄧文儀，《老兵與教授——陸官第一期生的傳奇經歷》（臺北縣：龍文出版社，2001年），頁129。

⁸⁵ 胡靜如，《燼餘掇拾（上）》，頁31-35。

了了之。⁸⁶ 據鄧文儀回憶，行營調查課曾於1933年底在南昌查到親福建（閩變）的一群「生產黨」人士，並將調查名冊交給熊式輝，但熊並未理睬。後來鄧文儀直接下令捉人，發現其中有很多人是熊式輝的下屬，還有一位是楊永泰的秘書。後來熊、楊因為此事向蔣介石告狀，批評鄧文儀。⁸⁷

熊式輝與復興社人士之關係，也不盡然是完全對立。事實上，省府保安處處長廖士翹（曾任黃埔教官）就是力行社在江西的主要負責人之一。⁸⁸ 廖氏為人忠厚，仰承熊式輝的指令，深受熊重用，可見熊式輝用人首重個人特質與服從程度。換個角度講，廖士翹既然有復興社背景，熊式輝也能透過他來安撫地方上的黃埔系。另外，力行社幹部康澤曾在江西星子縣成立訓練班，主要培養軍校畢業生，授以針對中共的各種情報及游擊體能訓練，用以支援正規軍剿共，此訓練班便是在獲得熊式輝首肯後成立的。⁸⁹ 所謂派系互動，並非鐵板一塊，更多是相互磨合、異中求同的過程。

在地方武裝的整頓方面，贛南地區（江西南部的18個縣）情形尤為複雜。該地位處4省交界，自古民風剽悍，歷經北伐與剿共的長年動盪後，地方武裝更為強勢。其中一部分較有勢力的是賴世璜的舊部，他們因對熊式輝有宿怨而自成半獨立狀態。贛南還有龐大的豪紳力量，影響政治與社會。這類勢力在地方上利用煙賭與走私牟利，還有不少與廣東軍系有所連絡。⁹⁰ 儘管部分武裝已經陸續被省

⁸⁶ 劉詠堯，〈我創辦掃蕩日報的回憶〉，收入中華文化基金會編，《掃蕩二十年——掃蕩報的歷史紀錄》（臺北：中華文化基金會，1978年），頁40-63。鄧元忠的《國民黨核心組織真相：力行社、復興社，既所謂「藍衣社」的演變與成長》第六章，指出《掃蕩日報》因為熊式輝屢次向蔣告狀而被停刊。然而事實上該報並未停刊，至1935年2月才隨南昌行營撤銷而結束。鄧書所引用的資料是《掃蕩二十年——掃蕩報的歷史紀錄》中收入的另一篇文章：彭可健撰寫之〈南昌——一個戰鬥報紙的誕生〉，然而此文內即表明，在力行社人士的堅持下，該報並未被停刊。

⁸⁷ 此為1974年鄧文儀接受鄧元忠訪問時所述。鄧元忠，《國民黨核心組織真相：力行社、復興社，既所謂「藍衣社」的演變與成長》，頁368。

⁸⁸ 鄧元忠，《國民黨核心組織真相：力行社、復興社，既所謂「藍衣社」的演變與成長》，頁105。

⁸⁹ 千國勳，〈關於所謂「復興社」的真實情況〉，收入千國勳等著，《藍衣社復興社力行社》（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4年），頁105-156。

⁹⁰ 徐浩然，《蔣經國在贛南》，頁49-51。北伐期間賴世璜因通敵嫌疑而遭免職處死，其部

政府收編為保安團隊，但始終態度微妙。熊式輝暫時無法改變贛南的現狀，只能任由這些勢力持續自主。直到抗戰期間，隨著戰爭大局的變化及蔣經國這一意外因素的到來，讓熊得以化解贛南方面的難題，詳見下一節論述。

除此之外，江西在剿共期間也有不少從境外前來支援的部隊，因派別思想濃厚，亦曾發生問題。胡靜如便親歷過一次「吉安兵變」：1933年中旬，一個剛完成整編的國軍師被派駐吉安縣支援剿共，其內部由滇黔地區的雜牌部隊組成。江西省政府獲悉這支部隊與兩廣勢力有勾結，欲背叛中央，而新任師長又與該師無淵源，難以穩定軍心。熊式輝於7月派保安處處長廖士翹偕胡靜如前往該師慰問，實則探查其動靜。兩人抵達吉安後，該師的歡迎檢閱儀式順利進行，晚上還設宴款待。不料就在當晚，該師即決定起事，派出部隊封鎖吉安四周縣分的交通、剪斷電報線阻隔通訊。廖、胡兩人接獲線報，趕緊乘車出逃，連夜繞道突破封鎖，還繞經湖南茶陵等地，幾日後順利回到南昌。後來，兵變的軍隊朝廣東方向移動，在被江西省政府出兵包圍下，最終自行潰散。⁹¹ 由此可見江西軍事問題的複雜，不只是既有的地方武裝，還因為剿共形勢而更加曲折。

隊交熊式輝率領。後有一說認為是熊式輝有意搶奪賴世璜的兵權，因此賴的舊部對熊極為反感。熊式輝晚年在回憶錄中澄清此事，見熊式輝著，洪朝輝編校，《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1907-1949）》，頁84-88。

⁹¹ 胡靜如，《燼餘掇拾（上）》，頁42-47。

肆、抗戰期間的權力鞏固與人才擴張

一、權力集中與開創新局

（一）集黨政軍領導權於一身

抗戰爆發後，中央黨、政、軍三方不斷摸索適應戰時體制的權力結構，而地方黨政制度也做出相應的調整。1938年3月，國民黨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決定大幅調整各級黨務機構。隨之而來的國民黨五屆四中全會，決議將省黨部改成主任委員制，縣黨部採書記長制，區黨部、區分部則採書記制。其後，中央開始修改各級黨部組織規章，在省級方面，省執行委員會設執行委員5-11人，並由中央指定其中1人（或另派中央委員1人）專任主任委員。主任委員主持會務，對外代表省執行委員會。而省執行委員除出席會議、襄理會務外，需分期分區赴各縣督察黨務、指導工作。⁹²

7月中旬，國民黨中常會決議改組江西省黨部，派熊式輝為江西省執行委員會主任委員，范爭波、劉家樹、蘇邨圃、熊在渭、楊度普、俞百慶、何人豪、薛秋泉、尹敬讓、周步光、陳際唐為執行委員，范爭波並兼任省執行委員會書記長。⁹³ 范爭波（1901-1983）是熊式輝在黨務方面的幹將，早年任淞滬警備司令部特務處長，為熊處理情報，後在剿共期間任江西反省院院長、《江西民國日報》社長、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幹事兼設計股長等職。⁹⁴ 後來，范爭波因故離開書記長一職，熊式輝又倚重劉己達（1901-1977）接任。劉氏早年參加改組派，後來進入復興社，成為康澤的得力助手，抗戰期間逐漸被熊式輝重用，成為心腹。⁹⁵

⁹² 〈五屆五中全會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部工作報告〉，收入林養志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組織工作》，下冊，頁114-154。

⁹³ 〈江西省黨部上中執會呈〉，《會議記錄》，典藏號：會5.3/89.8。

⁹⁴ 〈范爭波〉，《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典藏號：129-210000-0217；馬毓英，〈「新生活運動」最初階段的回憶〉，收入政協武漢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武漢文史資料》，總第27輯（武漢：編者，1987年），頁54-74。

⁹⁵ 蔡省三、曹雲霞，《蔣經國系史話》（香港：利通圖書文具公司，1988年），頁21；純武，〈劉己達其人其事〉，收入政協江西省宜豐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宜豐

1938年9月，熊式輝在省黨部就職典禮中發表講話，指出江西省黨部自1932年至今，共改組了9次，其中制度的試驗有3次，而名目的轉變則有7次。他宣布，這次改制與以往不同，是民主集權的領導制，汲取全體黨員的意見，並經少數幹部討論，最後由領袖決定一切問題的方針，以建立中央所要求的各級領袖制。⁹⁶ 這一制度變遷的意義在於，主任委員擁有最後的決定權，有別於以往省黨部的集體領導型態，執行委員的地位從此居於第二。因此，雖然省執行委員內CC系及心遠系等非熊式輝派的人物不少，但已無法撼動熊在黨權上的權威。至此，熊式輝終於在制度上集江西省黨政軍領導權於一身。

熊式輝擔任國民黨江西省執行委員會主任委員期間，省黨部內也陸續出現人事變動。1938年底，省黨部委員俞百慶因涉嫌貪汙案而去職，時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長的朱家驊與熊式輝共商，最後提請以馮琦補充執行委員職，獲得總裁蔣介石同意。⁹⁷ 馮琦在江西省主持特務活動多年，曾任省黨部調查統計室主任，原屬於CC系，但後來偏向熊式輝一方。⁹⁸ 其後，因范爭波、楊度普、劉家樹先後去職，於是以匡正宇、胡德馨、梁棟補充。這些補充進來的執行委員後來皆成為親熊式輝的一派。⁹⁹ 相關回憶指出，熊式輝透過朱家驊（1939-1944年間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來調整上述人事，使省黨部內的親熊勢力不斷擴大。¹⁰⁰

不過，熊式輝除了透過人事調整來增加自身影響力外，對其他各派的態度仍以共同奮鬥為主。而在省內各縣市黨部方面，根據省黨部執行委員周步光在一份

文史資料》，第3輯（宜豐：編者，1989年），頁62-66。

⁹⁶ 〈省黨部執委宣誓就職禮中 熊主任委員答詞原文〉，《江西民國日報》，南昌，1938年9月18日，版2。

⁹⁷ 〈批准朱家驊報告以馮琦為江西執行委員會委員案〉，《一般檔案》，黨史館藏，典藏號：一般138/179。

⁹⁸ 〈江西黨務：江西選舉〉，《朱家驊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檔案號：301-01-06-064。

⁹⁹ 〈江西省執委會工作報告〉，《會議記錄》，典藏號：會6.1/30.10；〈江西黨務：江西選舉〉，《朱家驊檔案》，檔案號：301-01-06-064。

¹⁰⁰ 張任石，〈國民黨江西各派系的鬥爭〉，收入政協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 政府·政黨》，頁157-166。然而該文在述及朱家驊主持的人事調派時，部分江西省執行委員的名單與檔案紀錄不符，屬回憶錯誤。

上呈朱家驊的分析報告中指出：熊式輝擔任主任委員期間，雖然對AB與心遠兩系頗為防範，但各縣黨部書記長人選多就原任黨員中選拔，並未有大幅調動，故有相當多的書記長為這兩派人馬。而省執行委員會內的委員亦多以黨務工作為重，未有明顯的派系動作。¹⁰¹ 由此可知，熊式輝任內，省級與基層黨部並未發生派系相爭的情形。

戰時的江西省黨部工作，對內主要為健全機構、完善人事與文書制度。對外則推動民眾組訓與戰時動員（如精神動員運動、社會服務、三民主義文化運動、各類婦女動員）、抗戰宣傳等。同時，亦對中共地下黨與日軍扶持政權實施調查與打擊。¹⁰² 而在總動員體制下，江西先後成立動員委員會、省動員會議，集結省內黨政軍高層幹部，共商動員業務，由熊式輝擔任最高指揮官，調度一切。

（二）戰局變遷下的綢繆——蔣經國與贛南

儘管熊式輝已在黨政軍三方面樹立統一的權威，但贛南地方的武裝力量仍為一大隱患。武漢會戰爆發後，江西成為接戰區，位在贛北的省會南昌頓感壓力，熊式輝也開始考慮將省政府南遷。於是，贛南地區的武裝便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贛南主要的勢力，包含寧都縣的黃鎮中部隊（名義上已被省府收編為保安團），以及諸多盤據一方的地方武裝，如大庾縣的賴天球（賴世璜舊部）、信豐縣的王廷驥等，他們包庇煙賭、集團走私、強迫民眾捐輸軍費，影響力廣達17縣，地方政令難以貫徹。¹⁰³

有回憶文獻稱，江西保安團第十九團團長黃鎮中及二十團團長黃世珍（賴世璜舊部），在1936年9月以抗議省府保安處剋扣餉械為名，於贛南的寧都縣宣布獨立。熊式輝知其並無力量動搖南昌，於是採取政治方法，派廖士翹前往寧都與兩位團長面談，承諾給予升官等條件，迅速化解一場危機。¹⁰⁴ 然而目前未見此事

¹⁰¹ 〈江西黨務：江西選舉〉，《朱家驊檔案》，檔案號：301-01-06-064。

¹⁰² 〈江西省執委會工作報告〉，《會議記錄》，典藏號：會6.1/30.10。

¹⁰³ 劉己達，〈我與蔣經國〉，《掌故》，第12期（1972年8月），頁2-13。

¹⁰⁴ 張任石，〈國民黨江西各派系的鬥爭〉，收入政協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 政府·政黨》，頁157-166。

件的其他佐證資料。根據後人為黃鎮中編寫的年表，也未提及該事件，但釀成更多矛盾的細節：黃鎮中與省方的糾葛橫跨約3年，起因是省府保安處內有官員懷疑黃的復興社背景，後來更直接決定裁撤第十九團，導致該團職官在1937年發生小規模的騷動。¹⁰⁵ 其後，第十九、二十團被併入康澤的別動隊，隨即又劃歸回省府。1938年3月中旬，黃鎮中擅自發起贛南抗日義勇軍，召集各縣代表在贛南的雩都開會，熊式輝知曉後即電令制止，並報告軍委會。後來省府將其部隊調離贛南地區。¹⁰⁶ 熊在1938年的日記中，多次提到贛南地方的不安情形，多與此有關。

贛南地區在地理上隸屬於江西省第四行政區及第八行政區，熊式輝為了解決贛南問題，於1938年春派劉己達擔任第四行政區行政督察專員。劉氏到任後，一面安撫一面壓制，卻仍不得要領，地方勢力也對其積怨日深，甚至達到水火不容的地步。1939年前後，省府決定派直屬保安團進剿贛南地方武裝，卻因贛北抗日軍事危急而將其轉調，進剿一事不得已告吹。¹⁰⁷ 也大約在這一時期，贛南又迎來一位特殊人物：蔣經國。

蔣經國（1910-1988）留學蘇聯多年，於1937年4月回到中國，並在同年10月攜眷到南昌居住。¹⁰⁸ 在蔣介石的託付下，熊式輝負責安排蔣經國的職務。1938年初，蔣經國擔任省府保安處副處長，旋兼任省保安司令部新兵督練處處長。除了接受熊的職務安排外，蔣經國喜歡接觸民眾、嘗試新挑戰，因此經常到各地探查民情。他知曉贛南地方勢力複雜，於是在1938年秋以保安處副處長的身分前去考察。到了當地，賴天球等地方武裝頗為歡迎，一番周旋後，這些贛南的勢力主

¹⁰⁵ 易烈相等編校，《黃鎮中烈士紀念集》（臺北：王文出版社，1990年），頁89-91。

¹⁰⁶ 熊式輝著，林美莉校註，《熊式輝日記1930-1939》，頁159。「吉章簡電蔣中正」，〈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七十二）〉，《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200-00499-066。

¹⁰⁷ 劉己達，〈我與蔣經國〉，《掌故》，第12期（1972年8月），頁2-13。

¹⁰⁸ 關於蔣經國到江西的原因，有說法是熊式輝為了「挾太子以自重」，增加自身政治資本於是建議蔣介石，讓蔣經國到江西歷練。見高理文，〈高理文回憶錄（二）〉，《傳記文學》，第69卷第2期（1996年8月），頁93-99。另有說法稱蔣經國是主動到南昌，熊式輝知道後打電報給蔣介石，於是蔣介石委託熊來栽培兒子。見王道平，〈出任專員前後〉，收入政協江西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政協贛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合編，《蔣經國在贛南》（南昌：政協江西省委員會，1989年），頁44-48。

動邀請蔣經國到贛州練兵。於是，蔣經國向熊式輝報告此事，熊認為這是得以改變贛南局勢的契機，自然相當支持。¹⁰⁹於是，蔣經國便在贛州成立新兵督練處的分處。同時，贛南地區的武裝也開始接受整頓，賴天球的武裝編為保安二十一團，王廷驥的武裝則編為保安二十二團。¹¹⁰

1939年3月南昌會戰爆發，南昌市於該月月底被日軍攻陷，省政府輾轉遷移到與贛南比鄰的泰和縣，而蔣經國的新兵督練處則遷移至贛州。也就在這一時期，熊式輝考慮讓蔣經國接替劉己達的專員職位，兩人經晤談後，蔣經國同意這一安排。¹¹¹可以合理的推測，熊式輝看見蔣經國與贛南的連結漸深，於是乾脆透過他來改變贛南局勢，不失為一妙計。同年6月起，蔣經國擔任江西省第四行政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對地方勢力來說，蔣經國的身分特殊，自難以用原來應付熊式輝的方法來對待，大多只能靜觀其變。

儘管如此，贛南地方根深蒂固的負面風氣與權勢網路，無法說變就變。從蔣經國在專員任內留下的諸多資料可知，他在施政上仍費盡心思。¹¹²不過，也因為省政府方面給予相當的支持及空間，才能讓蔣經國的新政構想得以落實。他在贛南提出「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飯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書讀」的口號，整頓吏治、禁賭禁毒，改善社會風氣，確實開創一番新氣象，頗受時人好評。¹¹³除此之外，熊式輝還讓蔣經國負責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江西支團，統籌江

¹⁰⁹ 彭哲愚、嚴農，《蔣經國在莫斯科》（香港：中原出版社，1987年），頁82-87；徐君虎，〈我同蔣經國在江西〉，《傳記文學》，第60卷第1期（1992年1月），頁36-40。

¹¹⁰ 劉己達，〈我與蔣經國〉，《掌故》，第12期（1972年8月），頁2-13。

¹¹¹ 「蔣經國電蔣中正宋美齡」，〈一般資料——蔣經國致蔣中正文電資料（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200-00624-029。根據劉己達回憶，當時他因受到地方勢力的羞辱，不願繼續擔任行政督察專員一職，於是極力向熊式輝推薦由蔣經國來繼任。劉己達，〈我與蔣經國〉，《掌故》，第12期（1972年8月），頁2-13。

¹¹² 蔣經國在贛南施政留下的資料，可參考何智霖編，《贛南與淞滬割記》（臺北：國史館，2009年）。

¹¹³ 有關蔣經國贛南新政的研究，可參考張瑞成，〈蔣經國先生在贛南——政治生涯的起點〉，收入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編，《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第二十輯（臺北縣：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1999年），頁277-316；張育仁，〈蔣經國在贛南改革之研究（1938-1944）〉（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2011年）。

西的戰時青年動員。¹¹⁴

熊式輝承蔣介石之託培養蔣經國，為領袖家事做出貢獻，也為其自身增添事功。而從江西抗戰局勢來說，熊在戰爭陰影席捲贛北之際，看準時機，加深蔣經國與贛南的連結，透過蔣經國來改變贛南地方政治與社會，亦是眼光獨到的一次綢繆。

二、風雲際會：廣納各方人才

隨著抗戰局勢的變化，中央轉變對共產黨與其他各黨派的態度，一些共產黨人、左傾知識分子也紛紛進入江西的抗戰隊伍。1938年初，江西省政府成立「江西青年服務團」，招收因戰爭而失業失學的知識青年，集中訓練以服務於各類抗戰工作。¹¹⁵ 熊式輝起用王枕心（1892-1967）擔任該團的總幹事。王枕心曾在北伐期間以跨黨人士身分參與過國民黨江西省黨務，並於清黨後脫離中共，1930年代來到熊式輝麾下。為增加青年服務團新血，王枕心透過共產黨友人夏征農，與新四軍駐贛辦事處主任黃道取得聯繫，讓中共方面安排一些青年進入服務團內。該團正式成立後，幹事會由王枕心、陳洪時、夏征農組成。根據相關回憶，一些共產黨人也在後來透過該團，陸續進入省政府民政廳工作。¹¹⁶ 王枕心本人則在抗戰期間擔任江西省臨時參議會議員、第三戰區黨政委員會委員等職，並曾為熊式輝處理抗敵後援會與動員相關業務。¹¹⁷

¹¹⁴ 蔣經國與江西三青團的成立，可參考王良卿，〈「新人」與「起家」——蔣經國先生的崛起與三民主義青年團〉，收入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編，《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第二十輯，頁339-392。

¹¹⁵ 〈修正江西省青年服務團組織大綱及工作綱要令仰知照〉，《江西省政府公報》，1011期（1938年3月），頁2-5。

¹¹⁶ 邱泉，〈王枕心與江西青年服務團〉，《前進論壇》，2022年9月號（2022年9月），頁60-61；向法宜，〈回憶江西青年服務團的活動〉，收入政協江西省南昌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南昌文史資料選輯》，第3輯（南昌：編者，1985年），頁52-56。

¹¹⁷ 熊式輝著，林美莉校註，《熊式輝日記1930-1939》，頁302；熊式輝，《熊式輝日記》（手稿本），1940年5月6日；〈王枕心〉，《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典藏號：129-020000-3341。

江西作為與前線接壤之地，有一批教授與作家為避戰禍而來，熊式輝盡地主之誼，成立「江西省地方政治講習院」供他們講學。該講習院旨在培養地方行政幹部，由熊式輝任院長，院內講師除了邀請黨政人士外，便是由這群學者擔任。講習院的副院長許德珩為實際主持院務之人，王造時、羅隆基、彭文應等學者，都在該院講學。¹¹⁸ 這些知識分子平日的立場與國民黨不同，但在抗戰的大環境下都集中到熊式輝所提供的環境來服務。

1939年，熊式輝為了進一步訓練地方行政人才，達到政治與教育相輔相成的理想，決定籌設中正大學。他廣泛爭取中央政要及地方社會的支持，並以私人名義召集一群民間學者共同商討、籌備。前後參與的學者有馬博厂、晏陽初、王造時、羅隆基等。隔年5月，教育部正式發出部令，成立籌備委員會。這些學者之中，馬博厂對中正大學的設立著力最多，其為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成員，受熊式輝之邀赴贛籌辦大學，日後繼續在熊手下任職，擔任中央設計局委員。¹¹⁹

熊式輝網羅的名流學者中，還有一位張含清，也是他辦理政治訓練的重要幹部。張含清早年跟隨鄧演達活動，後來加入平教會，抗戰初期到軍委會政治部擔任設計委員。1939年，應熊式輝之邀，到江西擔任地方政治講習院教育長，並延攬社會各派人士參與。¹²⁰ 熊式輝第一次與他面談時，認為「此人頗有熱忱，適為省辦理訓練人才主教。」¹²¹ 後來熊式輝主政東北，曾在1947年邀張含清到東北辦理訓練。¹²²

熊式輝在戰時的幹部群體中，有兩位昔日的共產黨元老，即葉青（任卓宣，1896-1990）及張國燾（1897-1979）。葉青在1928年脫離共產黨，成為反共理論

¹¹⁸ 胡靜如，《燼餘掇拾（上）》，頁118-119。許德珩為北京大學教授，早年曾參加中共外圍組織「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其後又任職於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戰後成立九三學社。

¹¹⁹ 何友良，〈熊式輝與中正大學的創辦〉，收入中國社科院近史所民國史研究室、四川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編，《一九四〇年代的中國》，下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頁983-1003。該文考察熊式輝日記，指出在1940年的日記中有67天記錄籌備中正大學的相關內容，可見熊的重視與期待。

¹²⁰ 徐浩然、易芳霖，〈回憶張含清先生〉，收入政協江西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江西文史資料選輯》，總第40輯（南昌：編者，1991年），頁134-139。

¹²¹ 熊式輝著，林美莉校註，《熊式輝日記1930-1939》，頁292。

¹²² 熊式輝，《熊式輝日記》（手稿本），1947年1月18日。

家，抗戰時期提倡三民主義研究。1940年應熊式輝之邀，到中正大學任教，隔年協助熊在江西發起「三民主義文化運動」。¹²³ 張國燾在1938年脫離中共，輾轉來到江西，跟隨熊式輝工作。從熊的日記來看，他在1941年3月與張國燾第一次見面，其後曾幾次與之討論黨務問題，並在隔年初召集張與其他幕僚共商國家總動員計畫方針。¹²⁴ 這兩位對黨務及政治理論頗具經驗的人，成為協助熊式輝規劃黨務的幕僚之一。

令人好奇的是，熊式輝如何看待這些「叛逃」的中共人士？可以從1943年6月熊在重慶與周恩來的一次對談中，窺見他的態度。當時周恩來批評葉青與張國燾的人格，並認為國民黨不但接納他們，還讓他們來解釋三民主義，等於是自我玷汙。熊當即反駁指出：任何人都可以解釋三民主義，正說明三民主義之偉大，而此2人離開中共乃基於個人意志，非國民黨所策動，故絕無損及人格之處；如今中共為了以儆效尤而誹謗其2人，否認其光明磊落之行為，實為不該。熊還直言：「余以為渠等跟隨中共碰壁多年，已蒙相當損失，今自警覺過去之錯誤途程，翻然改途，亦未始不可認為係一種進步。」¹²⁵

熊式輝有意將戰時江西打造成一個供各黨派活動的舞臺，其自身幹部群體的成員也有所增加。不過，他畢竟長年與中共打交道，瞭解中共在地方擴大勢力的野心，因此持續保持警戒。根據江西省黨部的報告，1938-1944年間，江西省情報機關破獲中共各級組織達千餘次，捕獲奸偽分子共計3,148人。其中，下至外圍人士與一般黨員，上至中共江西省委與其上級「南方工作委員會」之幹部。1942年，省黨部與省政府共同擬定「肅清奸偽殘餘組織分子號召自首自新運動實施方案」，派員到重要縣區號召中共人士轉變，至1944年共招到兩千三百多位自新人士。¹²⁶

¹²³ 熊式輝，〈江西早年推行文化運動之回憶（上）〉，《江西文獻》，第22期（1968年1月），頁5-7；劉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一八三）〉，《傳記文學》，第56卷第5期（1990年5月），頁132-152。

¹²⁴ 熊式輝，《熊式輝日記》（手稿本），1941年3月27日、1941年12月2日、1942年1月5日。熊式輝在抗戰時期擬定《國家總動員法》草案，並促成國家總動員體制之建立，其過程可參見余以澄，〈抗戰時期國家總動員體制的建立與實踐〉（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20年）。

¹²⁵ 熊式輝，《熊式輝日記》（手稿本），1943年6月16日。

¹²⁶ 〈江西省執委會工作報告〉，《會議記錄》，典藏號：會6.1/30.10。

熊式輝還有一位值得介紹的幹部：徐晴嵐（1908-1996），其早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就讀，回國後進入南昌行營任職，致力於辦報、推廣農村合作事業，並擔任江西省合作事業委員會委員。其不但有文才，對三民主義政治亦頗有見解，被熊式輝所注意，委任為江西省政府參事。1938年起，熊經常召集他與其他幕僚討論各類黨政事務方案，並讓他草擬相關文稿。中央設計局成立後，熊委任徐晴嵐為設計局委員兼秘書處處長，襄理局務。¹²⁷

1942年初，蔣介石派熊式輝擔任駐美軍事代表團團長，任務是與盟軍共商戰略規劃，並徵求軍備支援。於是，熊匆匆將江西省的政治職務交接他人。黨務方面，由梁棟接任江西省執行委員會主任委員。省政方面，除了將省政府主席職位交給老同學曹浩森外，省府各廳長沒有變動，王次甫仍掌民政廳、文羣仍掌財政廳、程時燦仍掌教育廳，楊綽庵仍掌建設廳。曹浩森就職後，基本上「熊規曹隨」，沒有改變熊式輝留下的省政格局。¹²⁸

熊式輝於1943年回國，接任中央設計局秘書長一職，負責戰後政治格局的規劃，從此便待在中央。從其日記來看，他到重慶後仍經常與來自江西的黨政人士互動，關心江西黨務的運作與紛爭，許多故舊也經常請他協助說項，謀求一官半職。由此可見，熊式輝在江西省統治10年所打造的政治威望及人脈體系已經根深蒂固，熊本人雖不在其位，仍掌握極大的話語權。同時，熊也再度成為蔣介石身邊的核心幕僚，個人聲望與政治影響力如虎添翼，與中央政學系官僚的互動更趨密切。

¹²⁷ 劉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二五四）〉，《傳記文學》，第69卷第1期（1996年7月），頁130-148。

¹²⁸ 陳榮華主編，《江西抗日戰爭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頁272-273。曹浩森（1886-1952），原名明魏，江西都昌人，日本振武學校畢業，早年參與辛亥革命、護國運動等，1921年赴日本陸軍大學深造。1928年任江西省政府委員兼建設廳長，其後陸續擔任軍政部陸軍署署長及常務次長、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參謀長等。1936年12月，任軍政部政務次長。1942年2月，任江西省政府主席，5月兼任全省保安司令。劉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第四冊，頁228-229。

伍、一位「政學系」官僚的政治性格與幹部樣態

熊式輝被視為政學系的代表人物之一，該系的主要人物多為高級官僚或具有才識的學者，利用人脈關係相互援引，產生不可忽視的政治影響力。政學系通常被認為是只有上層而沒有下層的鬆散政治群體，與一般的派系或組織截然不同，多數使用政學系名稱的人也只是为了方便統稱這群官僚而已。¹²⁹ 儘管關注上層官僚及其互動是學界研究政學系的主要視角，但曾擔任地方大員的熊式輝、楊永泰、吳鼎昌等人，為了省政的有效運作，身邊勢必需要一群幹部，而這類人物普遍缺少關注。如王又庸言：

如果我們可以假設這麼一個定義：「凡是在楊永泰、熊式輝和張羣手下做官比較長久或比較重要的核心人物，都算是新政學系分子」，那麼，記得在一九三六年十月，楊永泰被暗殺於漢口，珞珈山出葬之日，曾有人粗作估計，說這批人數有四十人左右，可能是大致不差的。¹³⁰

究竟，政學系上層官僚如何用人？其幹部群體呈現何種樣貌？又是否能成為其政治資本？本文前幾節即以熊式輝為主體，考察其權力塑造的過程中，陸續聚集到手下的核心幹部，他們與熊的關係網，以及如何在關鍵職位上為熊打造堅固的執政體系。本節將續論熊作為一位政學系官僚，具有的政治性格與選擇。

與熊式輝共事過或曾在其手下做事的人，對他的評價幾乎都是精明能幹、足智多謀，善於揣摩上意，在官場上捭闔縱橫。熊透過對政治機運的敏銳掌握，洞悉各種制度與人事運作的關鍵，加上人脈的經營，確實使他成為蔣介石幕僚群中的佼佼者。然而，這樣的政治性格也存在消極面，如思慮過剩、恃才傲物等，同樣被下屬看在眼裡。

¹²⁹ 有關政學系的研究，可參考唐德剛，〈政學系探源〉，《傳記文學》，第36卷第6期（1993年12月），頁21-30；金以林，《國民黨高層的派系政治（修訂本）》，頁508-546；林緒武，《從政學會到新政學系：國民黨體制內的資產階級自由派研究》。

¹³⁰ 王又庸原作，李若松提供，〈楊永泰與熊式輝：對唐德剛教授「政學系探源」大文的一件補充資料〉，《傳記文學》，第64卷第2期（1994年2月），頁57-64。

根據胡靜如回憶，熊式輝對自身才識相當自傲，看不慣表現太過亮眼的下屬。他鼓勵幹部多提計畫與意見，卻經常挑毛病，很少有完全讓他滿意的內容。若有不喜愛嶄露鋒芒又苦幹實幹的下屬，則正符合他的喜好。¹³¹ 不過作為儒家教育基底出身的官僚，熊式輝也經常在日記中反省自己講話鋒芒畢露、自視甚高等問題，偶爾也蒐集外人對他的評價來自省。例如1931年9月的日記中，便記錄外界對他的批評：「一、官僚式；二、奢侈；三、不懂革命；四、陰謀。」還有「一、對人不自然（即像煞有介事）；二、狡猾（令人畏厭如李麻子）；三、常言人隱諱。」¹³² 抗戰時期熊式輝曾與張治中互相品評對方性格中的缺點，熊將張對他的評論歸納成五點：好勝爭強、刻薄寡恩、政治不得人和、為環境所制、機巧。¹³³

在對幹部的舉用方面，儘管熊式輝經常依循私人關係，但對人才的招募也是不遺餘力，在本文前幾節的論述中亦能體會。此外，熊私淑蔣介石，在很多方面都喜歡模仿蔣的行事作風，尤其在儀容與排場上。根據回憶，熊日常出入省政府，都有警衛隊與軍樂隊並排相迎。在穿著上，除了注重自身儀態外，也規定省府職員的穿戴儀容，在下屬間形成一種風氣。¹³⁴

隨著熊在抗戰時期進一步穩固權力，以及在中央的話語權逐漸升高，身邊也有幹部建議他儘早建立自己的政治小組織。1940年7月，熊的幕僚張含清曾指出其缺點：見事太透、善於妥協各方、政治目標不澈底，並評價這樣的性格不易成功。他建議熊，政治上要有遠見，人事上要有準備，例如CC系及復興社皆有小組織，將來會成為一種政治力量，反觀熊太孤單，不足以成為政治活動的有力領導人。熊聽完他的話後，說道：

袁世凱、段祺瑞等之所以不能比總理，完全為無主義（即無較長遠主張），非無組織團體也。CC及復興於三民主義之外無他特異之主張，決不能脫離黨，自成一種力量。若云亦屬代表一部分人利益，將為一部分人所擁護，此則滿清「黃帶子」之作風，於國家無裨益，決不能長久支持

¹³¹ 胡靜如，《爐餘掇拾（上）》，頁19。

¹³² 熊式輝著，林美莉校註，《熊式輝日記1930-1939》，頁32-33。

¹³³ 熊式輝，《熊式輝日記》（手稿本），1941年5月14日。

¹³⁴ 胡靜如，《爐餘掇拾（上）》，頁53-54。

也。得道者多助，吾人但求如何發揚三民主義之光，如何履踐三民主義之實，則才智之士順之如歸市，德不孤必有隣，豈愁人之不我與耶？¹³⁵

這段話充分體現熊式輝對政治的見解，他當然與其他政治家一樣具有理想與抱負，也善於打造有益於施政及維護自身權力的幹部群體，但並不認為將一小撮人集結起來並提出特定的政治主張，會對自身政治仕途的發展有所幫助。張國燾也曾如此評價熊式輝：「政治活動無組織，經濟無基礎，是前清名臣作風。」¹³⁶ 政學系官僚之所以被蔣介石重用，主因是大部分人物僅以個人才識服務於蔣，或者說是依附於蔣，不像其他派系般急於打造下層基礎。熊式輝的政治性格正是如此，他習慣以個人之身追隨蔣介石，不另起爐灶，仰承領袖意見行事，這便是能被蔣長期重用的主因之一。

時間推到1945年10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東北行營成立，熊式輝擔任行營主任，開啟治理東北的新局面。他也提拔了一些昔日的幹部到東北任職，如行營秘書長胡家鳳、行營政治委員會政務處處長王又庸、財務處處長文羣，皆為熊式輝在江西的核心幹部。東北各省地方官員中，亦有熟面孔，如大連市市長龔學遂（後調青島市市長）、哈爾濱市市長楊綽庵、吉林省政府委員徐晴嵐、松江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廳長梁棟等。¹³⁷ 這些昔日幹部皆透過熊的關係進入東北政治圈。

然而，戰後東北的複雜性遠超過國民政府規劃接收時的想像，蘇軍延宕撤退、共軍勢力的發展等因素成為內政、外交上的難題，諸多情況讓熊式輝難以發揮。比起江西，其治理東北的成效顯得相對黯淡。1947年9月，熊辭去重擔。離開東北後，熊很快便淡出政治核心，政壇影響力大不如前。而其幹部除了持續留在東北任職者外，王又庸、文羣與胡家鳳在行憲後當選立法委員，胡家鳳並在1948-1949年間任江西省政府主席。而原本就留在江西者，如王枕心當選江西省參議會議長、彭醇士當選立法委員等。熊的昔日幹部大都持續在政壇上活動，各自發展，部分仍與熊保有私人友誼。

¹³⁵ 熊式輝，《熊式輝日記》（手稿本），1940年7月29日。

¹³⁶ 此段話是徐晴嵐轉述給熊式輝的。熊式輝，《熊式輝日記》（手稿本），1943年5月11日。

¹³⁷ 詳見劉壽林等編，《民國職官年表》（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

可以說，熊式輝在江西的10年間，打造了優秀的幹部群體，協助他達成「贛政十年」的治績，但他始終未將這個群體塑造成服務於個人的小組織，這樣的選擇來自他的政治性格與見識。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一個以熊式輝為中心發散出的官僚集團，始終未達到具體政治思想或身分認同上的共同體關係。或許可以這麼說，熊式輝與幹部群體的關係，正猶如熊自身政治實踐的延伸：一群幹部圍繞在熊的身邊，就如熊等政學系上層官僚圍繞在蔣介石身邊一樣，始終保持一種似近似遠的關係。

陸、結論

1949年後，熊式輝澈底離開政壇，旅居香港從事貿易、組織詩社，又至泰國經商，最後於1954年來臺定居。其作為現代史上著名的政治人物，面對的歷史評價相當複雜，尤其戰後東北的經歷牽涉到後續一連串的政局動盪，已成為無法抹滅的烙印。然而，正是因為其具有豐富的從政經歷與接近中樞的機會，映出的種種政治與人事才如此令人好奇。熊式輝依靠自身的膽識、機運與才能發跡，在北伐前後建立人脈，並在蔣介石心中留下位置，為往後20年的政治道路鋪下穩固的基礎。在統治江西的10年間，培養一群優秀幹部為其推動省政，在複雜的江西政治環境中站穩腳跟。從其政治生涯來看，江西10年的確是其一生最為光輝且建樹豐厚的時期。

觀察國民黨在江西省的黨務及黨政關係發展，有助於理解訓政時期地方治理的諸多細節。其中，地方政治派系及其背後與中央權力的聯結，是不容忽視的脈絡。不論AB團或心遠系，都與中央組織部的二陳關係甚深，也因此先後踏上江西政治的舞臺，在地方建立基礎。而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儘管熊式輝不斷與江西黨務群體周旋，且最終取得江西省黨政軍的領導權，但江西政壇上已經根深蒂固的政治派系仍然存在，依然是政治運作的一部分。以熊的政治性格來看，他善於權衡各派，成為不同派系間的「共主」，但他不願建立自己的政治組織，與幹部的關係大多僅止於行政官僚間的連結，故其於1942年離開江西後，省內的派系爭鬥又逐漸浮出水面，尤其在1944年新一輪的省黨部改組選舉前後。¹³⁸

¹³⁸ 有關1944年國民黨江西省第六屆全省代表大會的選舉及派系紛爭，可參考梁馨蓀，〈黨

在剿共期間，熊式輝與楊永泰一手掌握南昌行營的政治權力，透過這一軍事機構來統籌數個省分的黨務與政務，成為蔣介石的首席幕僚，還讓江西省政幹部劉體乾、王又庸等人跨足行營業務，擴大自身統治集團的格局，這在戰前國民政府的統治環境中，可謂獨一無二的經驗。從這個角度來看，行營並非一個單純在前線設置的軍事機構，而是在戰爭的大纛下，為了應對「戰時體制」，改造既有的黨政制度與行政體系運作，以達到黨政軍一體化指揮的特殊組織。當然，不是所有行營都如南昌行營般具有空前的權力，主要還是依賴戰爭局勢以及蔣介石是否坐鎮其中發揮著主導權。在蔣介石權力建構的歷程中，以軍事統帥的權威凌駕政治與黨務，這一模式在抗戰期間最為明顯且完備，但顯然早在剿共時期便已有過一番試驗。

熊式輝的用人有其自身喜好與標準，對人才的招募與培養亦頗費心，10年間培養了一群頗有能力的幹部。若其進一步將之凝聚，未嘗不能成為一股勢力。然而熊自有一套政治見識與選擇，他瞭解蔣介石不喜愛下屬另起山頭的性格，故習慣以一人之身服務領袖，否則也不會在1942年毅然決然的離開經營10年的江西，赴美國執行蔣所交付的任務。他的政治性格，可謂政學系上層官僚的一個典型。不過，不同人物的政治經驗與人脈、幹部群體性質互有差異，若能加以比較，應能使吾人對政學系的認識更加深刻。

內選戰：抗戰時期國民黨的地方選舉與派系角力》，《抗日戰爭研究》，2019年第1期（2019年2月），頁17-36。

徵引書目

一、檔案

- 《國民政府》（臺北，國史館藏）
- 〈保安機關組織法令案（一）〉。
- 《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
- 〈一般資料——民國二十二年（二）〉。
 - 〈一般資料——民國二十二年（四十五）〉。
 - 〈一般資料——民國二十四年（三十八）〉。
 - 〈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七十二）〉。
 - 〈一般資料——蔣經國致蔣中正文電資料（一）〉。
-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臺北，國史館藏）
- 〈胡運鴻〉。
 - 〈王枕心〉。
 - 〈吳健陶〉。
 - 〈龔學遂〉。
 - 〈范爭波〉。
- 《一般檔案》（臺北，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
- 〈批准朱家驊報告以馮琦為江西執行委員會委員案〉。
- 《政治檔案》（臺北，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
- 〈周利生等控贛省委李尚庸彭萬里〉。
- 《會議紀錄》（臺北，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
- 〈四全代會江西省黨務報告〉。
 - 〈江西省執委會工作報告〉。
 - 〈江西省執監委會上中執會電〉。
 - 〈江西省黨部上中執會呈〉。
 - 〈採用豫鄂皖剿匪區內暫行黨務整理綱要整理贛省縣市黨務案〉。
 - 〈報告江西黨務情形〉。
 - 〈程天放等3委員指導處理江西各處剿匪區域之黨務案〉。
 - 〈擬訂改進江西省黨務辦法案〉。
 - 〈總司令行營設立黨政委員會劃江西為九個剿匪區〉。
 - 〈關於江西省黨務整理案〉。

《特種檔案》（臺北，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

〈江西省黨部工作概述〉。

《朱家驊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江西黨務：江西選舉〉。

Shihui Xiong papers.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 Columbia University
Library, New York, USA.

Diary, 1940-1949.

二、史料彙編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 第五輯第一編軍事》。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編輯部編，《南昌行營：政治工作報告（一）》。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0年。

何智霖編，《贛南與淞滬筭記》。臺北：國史館，2009年。

林養志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組織工作》。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3年。

國史館編，《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1輯。臺北縣：國史館，1988年。

羅家倫主編，《革命文獻》第25輯。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70年。

三、年鑑、書志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國民黨年鑑：民國十八年》。出版地不詳：編者，出版年不詳。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國民黨年鑑：民國二十三年》。出版地不詳：編者，1934年。

傅伯言主編，《中國國民黨江西省地方組織志》。北京：團結出版社，2006年。

劉治乾主編，《江西年鑑》。南昌：江西省政府統計室，1936年。

四、日記、回憶錄、訪問紀錄

胡靜如，《燼餘掇拾（上）》。臺北：龍文出版社，1994年。

- 陳存恭、潘光哲訪問，潘光哲紀錄，《劉象山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
- 程天放，《程天放早年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8年。
- 黃郭著，任育德主編，《黃郭日記（1929-1930）》。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19年。
- 熊式輝著，林美莉校註，《熊式輝日記1930-1939》。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22年。
- 熊式輝著，洪朝輝編校，《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1907-1949）》。香港：明鏡出版社，2008年。
- 滕傑口述，勞政武編撰，《從抗日到反獨：滕傑口述歷史》。桃園縣：淨名文化中心，2014年。
- 鄧文儀，《老兵與教授——陸官第一期生的傳奇經歷》。臺北縣：龍文出版社，2001年。

五、公報、報紙、雜誌

- 《民國日報》，上海，1920、1931年。
- 《江西民國日報》，南昌，1931、1938年。
- 《江西省政府公報》，南昌，1933、1938年。
- 《傳記文學》，臺北，1990、1992、1993、1994、1996年。
- 《新聞報》，上海，1930年。

六、專書

- 干國勳等著，《藍衣社復興社力行社》。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4年。
- 中華文化基金會編，《掃蕩二十年——掃蕩報的歷史紀錄》。臺北：中華文化基金會，1978年。
- 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編，《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第二十輯。臺北縣：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1999年。
- 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型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
- 田原天南編，《清末民初中國官紳人名錄》。臺北縣：文海出版社，1996年。
- 何友良編，《江西通史》。臺北：昌明文化出版社，2018年。
- 吳相湘，《民國百人傳》。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1年。

- 易烈相等編校，《黃鎮中烈士紀念集》。臺北：王文出版社，1990年。
- 林緒武，《從政學會到新政學系：國民黨體制內的資產階級自由派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
- 金以林，《國民黨高層的派系政治（修訂本）》。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
- 政協全國委員會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合訂本）》。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1年。
- 政協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 政府・政黨》。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
- 政協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 軍政人物（下）》。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
- 政協江西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政協贛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合編，《蔣經國在贛南》。南昌：政協江西省委員會，1989年。
- 政協江西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江西文史資料選輯》，總第9輯。南昌：編者，1982年。
- 政協江西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江西文史資料選輯》，總第12輯。南昌：編者，1983年。
- 政協江西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江西文史資料選輯》，總第14輯。南昌：編者，1984年。
- 政協江西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江西文史資料選輯》，總第40輯。南昌：編者，1991年。
- 政協江西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江西文史資料》，總第2輯。南昌：編者，1980年。
- 政協江西省宜豐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宜豐文史資料》，第3輯。宜豐：編者，1989年。
- 政協江西省南昌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南昌文史資料選輯》，第3輯。南昌：編者，1985年。
- 政協武漢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武漢文史資料》，總第27輯。武漢：編者，1987年。
- 徐浩然，《蔣經國在贛南》。臺北：新潮社，1993年。
- 國防部史政局編，《剿匪戰史》。臺北：國防部史政局，1962年。
- 郭華倫，《中共史論》。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東亞研究所，1982年。
- 陳榮華主編，《江西抗日戰爭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
- 彭哲愚、嚴農，《蔣經國在莫斯科》。香港：中原出版社，1987年。

- 臺北市江西同鄉會編，《江西近代鄉賢錄》。臺北：臺北市江西同鄉會，1998年。
- 劉國銘主編，《中國國民黨百年人物全書》。北京：團結出版社，2005年。
- 劉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0年。
- 劉壽林等編，《民國職官年表》。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
- 蔡省三、曹雲霞，《蔣經國系史話》。香港：利通圖書文具公司，1988年。
- 鄧元忠，《國民黨核心組織真相：力行社、復興社，既所謂「藍衣社」的演變與成長》。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0年。
- 鄭學稼，《中共富田事變真相》。臺北：國際共黨問題研究社，1976年。
- 鄭學稼，《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史》。臺北：政大出版社，2019年。
- 錢端升等著，《民國政制史》。上海：上海書店，1989年。
- 贛政十年編輯委員會編，《贛政十年》。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41年。

七、期刊論文、專書論文

- 方鵬程，〈文羣先生史事專訪〉，《近代中國》，第35期（1983年6月）。
- 何友良，〈熊式輝與中正大學的創辦〉，收入中國社科院近史所民國史研究室、四川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編，《一九四〇年代的中國（下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
- 邱泉，〈王枕心與江西青年服務團〉，《前進論壇》，2022年9月號（2022年9月）。
- 洪軌，〈民國十六年江西四二事變回憶〉，《江西文獻》，第13期（1967年4月）。
- 高華，〈肅「AB團」事件的歷史考察〉，《二十一世紀》，1999年8月號（1999年8月）。
- 常存真撰，楊文麒校，〈前江西省建設廳長楊綽庵先生傳〉，《江西文獻》，第145期（1991年7月）。
- 梁馨薈，〈黨內選戰：抗戰時期國民黨的地方選舉與派系角力〉，《抗日戰爭研究》，2019年第1期（2019年2月）。
- 笹川裕史，〈1930年代国民政府の江西省統治と土地税制改革〉，《歴史学研究》，第631號（1992年4月）。
- 許師慎，〈江西省政府職官表〉，《江西文獻》，第99期（1980年1月）。
- 熊式輝，〈江西早年推行文化運動之回憶（上）〉，《江西文獻》，第22期（1968年1月）。
- 劉己達，〈我與蔣經國〉，《掌故》，第12期（1972年8月）。
- 謝藻生，〈我所知道的南昌行營〉，《世紀行》，第1期（1995年1月）。

八、學位論文

李政儒，〈熊式輝與江西省政（1931-1941）〉。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16年。

余以澄，〈抗戰時期國家總動員體制的建立與實踐〉。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20年。

張智瑋，〈蔣中正國家建構的型範：戰前江西之經驗（1930-37）〉。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14年。

董千萍，〈熊式輝督贛時期的江西經濟建設（1931-1941）〉。上海：東華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